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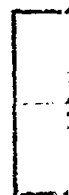
包清岑編

抗戰文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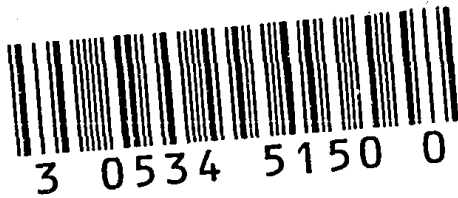
第二輯

第三類——團結統一與鞏固中樞
第四類——軍事上的經驗和教訓

拔提書店印行



573.07
840
12



抗戰文選第二輯目錄

第三類 團結統一與鞏固中樞

- 一·集中力量抵抗暴敵……………蔣中正（一—二）
- 二·尋求與國與團結民衆……………汪兆銘（三一—二〇）
- 三·就尋求與國與團結民衆再引申幾句話……………汪兆銘（二一—二六）
- 四·中國的統治抗戰與領袖……………任覺五（一七一—一三〇）
- 五·絕對的愛國主義……………張君勱（三一—三七）
- 六·抗戰中之黨派問題……………陳銘樞（三九—四五）
- 七·抗敵大團結的根本意義……………陶希聖（四一—四九）
- 八·關於民主政治……………葉青（五〇—五七）
- 九·關於政治黨派……………葉青（五八—六五）
- 十·關於政治機構……………葉青（六六—七三）
- 十一·國家戰時軍治化……………大公報（七三—七四）
- 十二·主權政權與黨權……………武漢日報（七五—七六）

- 十三·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陳銘樞等（七九—八〇）
- 十四·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宣告解散感言……………大公報（八一—八二）
- 十五· 中國青年黨代表左舜生上 蔣汪正副總裁書（附總裁覆書）……………（八三—八四）
- 十六· 國家社會黨代表張君勱函蔣汪正副總裁願團結共赴國難……………（八五—八七）
- 十七· 中共中委張國燾申明……………張國燾（八八—八九）
- 十八· 國際反侵略會代表色斯慷慨陳詞……………（九〇—九二）

第四類 軍事上的經驗和教訓

- 一· 如何使用民力……………汪兆銘（九三—九七）
- 二· 抗日建國建軍之任務……………陳誠（九八—一〇一）
- 三· 總動員與國民道德……………蔣方震（一〇二—一〇六）
- 四· 速決與持久……………蔣百里（一〇七—一一〇）
- 五· 西戰場之形勢……………張其昀（一一一—一二六）
- 六· 義軍的歷史教訓……………陶希聖（一二七—一三三）
- 七· 思想的武裝與行動的武裝……………康澤（一三三—一三五）
- 八· 抗戰建國綱領的性質與精神……………陶希聖（一三七—一四〇）

抗戰文選

第二輯

第三類 團結統一與鞏固中樞

集中力量抵抗暴敵

蔣中正

——二十六年九月二十四日談話——

民族意識勝過一切

精誠團結共赴國難

在中國國民黨領導下 致努力

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

國民革命之目的在求中國之自由平等，總理曾說明三民主義為救國主義，即希望全國國民一致為挽救國家危亡而奮鬥，不幸十年以來，一般國人，對於三民主義，不能真誠一致的信仰，對民族危機，亦無深刻之認識，致使革命建國之過程中，遭受不少之阻礙，國力固因之消耗，人民亦飽受犧牲，遂令外侮日深，國家益趨危殆，此數年間，中央政府無日不以精誠團結共赴國難相號召，而國人昔日之懷疑三民主義者，亦均以民族利益為



重，放棄異見，而其趨於一致，足證國民今日皆已深切感覺存則俱存，亡則俱亡之意義，咸認整個民族之利害，終超出於一切個人一切團體利害之上也，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即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宣言中所舉諸項，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銷蘇區與紅軍，皆為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且均與本黨三中全會之宣言及決議案相合，而其宣稱願為實現三民主義而奮鬥，更足證明中國今日祇能有一個努力之方向，余以為吾人革命，所爭者不在個人之意氣與私見，而為三民主義之實行，在存亡危急之秋，更不應計較過去一切，而當使全國國民澈底更始，力謀團結，以共保國家之生命與生存，今日凡為中國國民，但能信奉三民主義而努力救國者，政府當不問其過去如何，而咸使有效忠國家之機會，對於國內任何派別，祇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之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咸使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之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總之，中國立國原則，為總理創制之三民主義，此為無可動搖無可移易者，中國民族既已一致覺醒，絕對團結，自必堅守不偏不倚之國策，集中全國整個民族之力量，自衛自助，以抵抗暴敵，挽救危亡，中國不但為保障國家民族之生存而抗戰，亦為保持世界和平與國際信義而奮鬥，世界明達之士，必能深切瞭解之也。

尋求與國與團結民衆

汪兆銘

抗戰期間，有兩件事要注意的，一是尋求與國，一是團結民衆，這兩件事在平時已是必要，在抗戰期間尤爲急切。

先說尋求與國，三中全會宣言裏頭有「循國際和平之路線以前進」的一句話，這一句話指示了我們今日的外交方針。所謂國際和平，不是泛泛的，其最大意義，是反對侵略，其表現出來的，如國際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等等，中國在歷史上從來沒有侵略他人的事實，在現在環境上，中國正在努力完成現代國家的建設，正如總理孫先生就職第一任大總統時宣言「中國要盡文明國應盡之義務要享文明國應享之權利」，也正如遺囑所言「求中國之自由平等」，因此之故，中國對於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確實遵守，爲的是要維持世界之和平與正義，同時也爲的是中國在維持世界之和平與正義的環境裡得以努力完成建設現代國家的任務，自「一九一八」以來，中國將中日問題提出國聯，以迄今日，中國參加九國公約會議，都是本此一貫之方針，賅括言之，便是循國際和平之路綫以前進，這不是泛泛，是反對侵略，如今九國公約會議已經在北京開始進行，我們先就此點作一討論，九國公約何以於此時才召集呢，自從「一九一八」事件

發生以來，本就有入主張將中日問題付之九國公約會議，然其後卻付之國聯，其理由是國聯盟約對於違約的國家是有制裁的，如果判斷日本為侵略國，而日本不肯服從，便會對於日本施行經濟制裁等等，反之，九國公約卻沒有制裁的規定，依第七條的規定，對於糾紛，只能加以設論，當時將中日問題提出國聯，而不提出九國公約會議，其原因實在於此，而國聯派遣調查團時，邀請美國代表參加，及至李頓報告書提出後，國聯雖然沒有判斷日本為侵略國，予以制裁，但已經判斷日本之進兵東北，並非出於自衛，反面說來，既然不是出於自衛，不是侵略，是什麼呢，此次國聯開會，對於日本進兵中國河北各省以及上海，以及濫用飛機在中國首都及其他各處肆行轟炸，已經切實予以譴責，對於中國之堅決抵抗，已經予以深厚的同情，但仍然沒有明白判斷日本為侵略國，予以經濟制裁，其原因係鑒於去年對於義大利之侵阿比西尼亞，予以經濟制裁，而不能得到效果，所以如此持重，然而日本之橫行無忌，不但危害中國，而且危害世界和平，是有主張和平正義的國家所萬萬不能忍受的，因此才有九國公約會議發起，這是為和平與正義，值得重視的。

現在對於九國公約會議的前途，有些人抱着樂觀，有些人抱着悲觀，樂觀的見解，以為這次會議，除了九國公約原簽字國外，並邀請蘇聯及德國參加，這些強有力國家，會議一堂，必能為和平正義努力到底，不使侵略主義的日本得以肆其野心，樂觀的見解

，則以爲此次九國公約會議之目的，在於調解，這調解案如何可以成立呢，如果中國所能接受的，未必是日本所願聞，如果合於日本的脾胃的，未必是中國所能容忍，如果勉強日本，將就中國，是要拿出力量來的，如果勉強中國，遷就日本，於道理上說不過去，這兩種不同的見解，都可謂持之有故。

然而中國此次所以決然參加會議，是十分相信此次會議之動機，出於維持和平與正義，在這會議裡，將日本之野蠻侵略，而越使日本陷於孤立，將因中國之堅決抵抗，予侵略者以打擊，而越使中國得着世界之同情，日本現在已經悍然拒絕參加此次會議了，已經使其孤立狀態盡情暴露了，將來各國以拒絕，則其甘心破壞正義和平之罪惡者，更屬盡情暴露，而成爲世界之公敵，如此說來，中國此次抗戰，是反對日本之侵略，不但爲中國自己生存盡其責任，同時爲世界之正義與和平盡其責任，正是遵守著「循國際和平之路綫以前進」的一貫外交方針，而各國之所以於此時公開九國公約會議，其目的也正在維持國際和平之局面。

不論他所用的詞句爲調解，爲調停，而其目的是反對侵略維持和平，是極正大的極明白的，因此之故，中國今日正合着孟子所說的「得道者多助」那一句話，尋求與國，爲勢較順，現在支持國際和平的局面的，有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諸簽字國，而英美法蘇實爲其重心，自「一九一八」以來，英美法一直是反對侵略，維持和平，而且

日本向中國侵略，不但中國蒙其禍，英美法亦感威脅，在利害上有共同之點，至於蘇聯，情勢更是迫切，就過去而論，兩國都經過埋頭準備的工作，例如二十一年中蘇雖已恢復邦交，然蘇聯因為埋頭於兩次五年經濟建設計劃之故，曾經出賣中東鐵路於日本，曾經與偽滿洲國交換領事，中國因為埋頭於統一建設及種種必要標準之故，自塘沽停戰協定之後，對於日本之逐步侵略，往往忍無可忍，但仍然忍下去，這些都是事實，但是自從中國全面抗戰開始以來，蘇聯已經和中國訂了互不侵犯的條約，兩國國交，已經有進一步的結合了，日本的侵略，中蘇兩國感覺着共同利害，這種感覺，因為日本侵略之益劇烈，而日益深切，是無疑的，近來頗有一部分人士持著一種見解，以為中國必須拋棄了對於資本主義國家的信賴，方才可以得到蘇聯真實的援助，這種見解，在上海幾種刊物上都看過，兄弟以為這種見解是看不清楚現在國際和平之路線，看不清楚現在中國須循着國際和平之路線以前進，不用說別的，只怕連蘇聯聽了，也嚇一跳，也會把肩頭聳起，也會把舌頭伸了出來，不用看別的，只要看看蘇聯的外交。蘇聯為什麼要參加國聯呢，蘇聯為什麼要和法國訂立互助協定呢，蘇聯為什麼要對於英美汲汲的增進友誼呢，世界上沒有一個國家不注意于自己的生存的，既注意于自己的生存，沒有不防到自己陷于孤立的，尤其沒有一個國子為自己生存的原故，不得已而與人作打手時，不去尋求幫手的，蘇聯自從新經濟政策兩次五年計劃實行以來，已漸漸成爲世界上一個強國了，而

其國家在地理上又處于半不怕人侵略的境遇，然而注意國交尋求與國汲汲如此，那麼聽了我們這般的高調，嚇了一跳，把肩膀聳起，把舌頭伸了出來，決不是虛構的想像，此外，還有一部人士持着一種見解，以為中國至少須把法西斯蒂的國家撇開。這也是不對的，如今世界上的國家已不是從前的時候，會因基督教與非基督教而興起十字軍，因新教與舊教而發生混戰，所謂因主義相同而結合，其成分遠不如因利害相同來的密切，中國與此等國家之關係，以主義論，各有其政治之自由，各人選擇其最適合於自己國情之制度，而加以損益，期于適用，用不着彼此相強，以利害論，彼此利害並無衝突，友誼與商務關係經濟關係日益增進，有什麼理由將他撇開，這不是孟子所說為淵驅魚為叢驅雀麼。尤其是德國，他因戰敗之後，備嘗痛苦，想解除不平等之束縛，恢復平等的地位，其努力更足使我們起敬，至於其他各國，縱使和中國無甚密切關係，但于正義人道上作公正的主張，即是于世界有益，亦于中國有益，例如當國聯投票取決中日問題的時候，前此放棄投票的，只有一個暹羅，此次暹羅之外，只有一個波蘭，這可見各國對於正義人道熱心維持，對於日本之暴行深惡痛絕，對於中國之堅決抵抗，於深厚之同情，這些都是我們所不容忽視的。總之，中國的外交方針，既然認定要循國際和平之路線以前進，則凡反對侵略者，都可以為中國之與國，中國惟有盡其在我，以博得各國之同情，進而得各國之援助，進而與各國對於侵略者加以制裁，這是中國平日應取的態度，尤其

是在抗戰期間應取的態度。

再說團結民衆，抗戰之目的，在把垂亡的中國挽救回來，而使之復興，欲達到此目的，惟有合四萬萬人之衆，以必死之決心，盡可能的努力，努力所在，第一自然是軍事，以四萬萬人之衆，如果加以訓練，前赴戰場，前仆後繼，則抗戰必能持久，而得最後勝利，第二是政治經濟財政教育以至文學等等方面，不問爲精神的物質的，一切都要集結起來，加緊工作，再切實說句：這些工作，不但不可因抗戰而放鬆，並且要因抗戰而加緊，因爲抗戰的意義，不但以消極方面要消耗敵人的力量，尤其在積極方面要增長我們的力量，這是抗戰能持久的基礎，也是抗敵能得到最後勝利的基礎，如此說來，抗戰不只是前方將士的事，而是全國各地民衆的事，民衆之努力與否爲抗戰能否持久能否因持久而得到最後勝利之最大關鍵，所以團結民衆，在平時固然必要，在抗戰期間，尤爲緊急，如今的問題，是如何才能團結民衆呢，有人說道，歐洲大戰期間，如英如法，皆是全國民衆不分派別一致團結，無論政治上經濟上各種見解，繁然各殊，只要認定國家高于一切，便能團結起來，一致努力，這種說法，在國本已定民主政治已經告成之英法等國自然可以行得去，如果在國本正在樹立的過程中，民主政治正在開始訓練尙未成熟的中國，今日就不能再加以考慮了，因爲在這樣風雨飄搖的今日，團結民衆，不可不有一個中心，不可不以一個主義爲中心，民衆有了一個主義，對於過去現在，方才認識得

抗戰文選

清楚，對於將來，方才有了準確的方向，而把握定了，邁步前進，上頭說過，抗戰不只是軍事，而是遍及於政治經濟財政教育以至文學等方面，既然方面如此之多，愈不能不有一個主義，以爲之統率了，單就軍事來說，三月以來，事實的昭示，凡是受過三民主義的訓練之軍隊，其抗戰能力必然強大，我們不必將軍隊的番號列舉出來，只就人人所知的，南口之全團殉職，寶山之全營殉職，以及各處戰線前敵將士之未奉命令有死無退，便一一足以證明，總而言之，三月以來，無日無時，不是以將士的血肉，尤其是以精兵良將的血肉，築成壕塹，來阻遏敵人的前進，他們爲什麼有這種壯烈犧牲的精神呢，因爲平日受過三民主義的訓練，明白了民族主義，上要對得起祖宗，下要對得起子孫，明白了民權主義，民生主義，知道了向前進，中國必然得到了自由平等的光明快樂，反之，必將陷于奴隸，有了三民主義，站在前面，引之導之，使之向前而進，所以又奮發，又沉着，將一己的血肉，築成阻遏敵人侵略的一條壕塹，同時也築成了四萬萬同胞及其子孫所同走上的一條光明快樂的大道，我們相信，每一個精兵良將，當其殺身成仁的時候，沒有不把三民主義之實現，爲其最大之代價，及無上之安慰的，軍隊方面如此，其他一切方面何莫不然，有了主義，纔有信仰，纔有精誠，有了精誠，纔能團結，纔有力量，有了力量，纔能持久，纔能得到最後之勝利，故不言團結則已，言團結不可不有一個中心，不可不以主義爲中心，不可不以三民主義爲中心，在中國國民黨同志，

每一念及三民主義之未能實現，固然引為莫大之責任，在中國同胞，亦必認定此危急存亡之際，唯有三民主義，纔可以把民衆團結起來，所以中國共產黨最近宣言，亦切實聲明願為三民主義之實現而奮鬥，我們如果這樣的合四萬萬人之身，以為一身，合四萬萬人之身，以為一心，則抗戰必能持久，持久必能得到最後之勝利，是無疑的，我們今日在抗戰期間，紀念總理誕辰，覺得有無限感動，無限興奮，謹以此言為小小的貢獻。

(二十六年十一月十二日大公報)

就尋求與國團結民衆再引伸幾句話

汪兆銘

本月十二日 總理誕辰，兄弟曾有一段說話，題爲「尋求與國團結民衆」，今日所說大意還是差不多，只不過加以引伸便了。

論到抗戰自然應該下了決心，有人幫忙也抵戰，沒人幫忙也抗戰，而在有了這決心之後，自然應該尋求與國以期達到勝利這是無疑的。

九一八以來，世界各國的同情，可以說全數，至少可以說最大多數都在中國，中國以被侵略之故，而失去各國的同情，所謂「失道者寡助」，這也是無疑的。

如今所要討論的，一是分量問題，一是時間問題。

何謂分量問題，所謂尋求與國，自然最好是共同作戰，次之對日本經濟制裁，次之對我經濟援助，又次之對我予以道德上的同情，又次之不至於袒護日本以危害中國，然而非做到共同作戰，不能打倒危害世界和平正義的惡魔，這是人人知道的，而日本自九一八以來，所以敢悍然出此危害中國危害東亞，危害世界的手段，一往直前，無所底止，就是看穿了各國並無共同作戰的決心，所以旁若無人一至於此。

何謂時間問題，即使各國有了共同作戰的決心，而何時發動，所關甚大，舉一個極

明白的例，歐洲大戰單是法國，決不能與德國相持的，幸而戰事之始，就有英俄共同作戰，及其後加入美國，而勝負以定，人人知道沒有美國，決不能得到最後勝利，人人尤須知道若是戰事之始，沒有英俄，決不能持久，以待至美國加入而得到最後勝利，倘使英俄亦如美國之徘徊觀望，遲之又久，則法國早就不能支持了，由此言之，不但共同作戰是必要，而共同作戰之及時也是必要。

由此可知，中國即使站在「得道者多助」的地位，而助的分量，助的時間，是中國勝負所關，亦即是中國存亡所繫，如今所要討論的，應該集中於此點。

日本侵略中國所危害的不止中國，而是東亞。而是世界，嚴正來說，日本之不顧國際正義與信約，悍然破壞和平，將國聯盟約九國公約非戰公約一手撕碎，不止與中國作戰而是與世界各國作戰，因此之故，世界各國一致起來與中國共同對日本作戰，是當然的，其中英美法諸國在遠東利益，為日本所威脅所妨害，為維護其利益，與中國共同對日本作戰，更是當然的，其中蘇俄明白得很，日本侵略中國，即是侵略蘇俄，深切些說，日本之所以侵略中國，就為的是侵略蘇俄，假如中國北部或全部，受了日本侵略，日本即將以之作為侵略蘇俄之根據地，所以中日戰爭，無異是日俄戰爭之前哨戰，蘇俄為共同利害計，與中國共同向日本作戰，其為當然，尤無可疑，有人駁道：「現在中日戰爭都是在中國領土以內，為什麼要其他國家來共同作戰」，這話不然，歐戰之始，德奧

與俄法比作戰都是在其領土以內，英國隔了大海，真所謂風馬牛不相及，爲什麼英國也來共同作戰，因爲國家利害，要從整個大局來看，不要從部分領土來看，所以毅然決然共同作戰，毫不猶豫，日本之侵略中國，所危害者不止中國，世界各國，一致前來共同作戰，尤其是關係最深之國，劍及履及，前來共同作戰，在理論上，實是當然的。

只是現在支配世界的，不止理論，除了理論之外，還有事實，事實有時不受理論的支配，有時還轉而支配理論，中國在九一八以前，並沒有如歐戰以前，有所謂協商國的存在，則一旦事變突起，其形成一個中國單獨對付一個日本是必然的，於是有人責備道：「然中國爲什麼不早些安排呢」，事實擺在面前，中國加入國聯，加入九國公約，加入非戰公約，何嘗不極力的尋求與國，無如歐戰以來，各國都有一個共同傾向，便是時時刻刻準備戰爭，而又時時刻刻避免戰爭，這兩種矛盾心理，及矛盾現象，時時刻刻都在變動，除此之外，還有各國間各自的內部隱憂，還有各國間相互的利害衝突，感情衝突，還有各國間各目的看法，看得其他問題，比中日問題還要重要，還要迫切，因此尋求與國，雖然中國感覺得十分必要，而始終尋求不著，於是又有人責備道，「中國若欲尋求與國，只有蘇俄，因爲中國沒有誠心尋求，所以得不到蘇俄的共同作戰，」事實擺在面前，蘇俄之準備戰爭，與避免戰爭，與其他各國，並無二致，而且還有以下幾個原因，其一，蘇俄爲什麼由世界革命主義而變爲一國社會主義呢，是否欲埋頭建設，暫時與

人無兢與物無爭，而養精蓄銳以待天下之變，如其是也，蘇俄是否輕于參加戰爭，其二，蘇俄東顧有日本之憂，西顧有德國之憂，此外還有波蘭，此外還有義國，蘇俄所汲汲加入國聯，與法國訂立互助協定，結合英國乃至美國其意至明，在此互相牽制的局面下，蘇俄是否以一國輕于參加戰爭，其二，即專以對於日本而論，蘇俄地勢，在軍事上，顯然是利于取守勢，西伯利亞苦寒的氣候，廣漠的平原，即使與日本支持兩三年，莫斯科是不會發生什麼影響的，蘇俄是否肯輕于改取攻勢，以上三個疑問，只要常識常理來說，其他外交秘密，政治秘密，經濟秘密，軍事秘密，且置不談，然即就常識常理來說，已可窺見一斑了，於是又有人責備道，「因為中國不能一心一意尋求蘇俄，所謂掘九井而皆不及泉，不如掘一井之為愈，」這話奇怪，蘇俄加入國聯，蘇俄與法國訂立互助協定，蘇俄結合英國乃至美國，如上所述，那麼為什麼中國卻只要一心一意向著蘇俄呢，於是又有人責備道。「日德義與英美法蘇是兩大對壘，正和歐戰前德奧義的同盟與英法俄的協商，形成兩大對壘一樣，中國究竟應該站在那一邊呢，中國為什麼還要與德義，形成友好關係呢，無怪英美法，尤其蘇俄，有些不放心中國的態度與決心了」，這話也是奇怪，英國不是明明白白與義國謀友誼之維持與增進麼，不寧惟是，英之與義法之與德，也正在謀衝突之減輕關係之增重，蘇俄之于德義，雖似隔閡，其外交作用，也何嘗稍有休歇，因為外交作用，莫大于尋求與國，減少敵國，例如歐戰以前，德奧義是同

盟的，英法苦心孤詣，將義國拉出同盟，變為中立，其後還將義國拉入協商，謀國之忠，固宜如此，除了存着一種壞心事，所謂伐人之國必先伐其交，才會勸人斬斷了其他各國一切關係，而一心一意，投入一國的懷抱裏去，日本前此所謂中國好以夷制夷，即是此一種壞心事之表現，唉，說這些話的，如果別有用心。我還有什希望，如果還有一點愛國心，我勸他快些將這些話收回去罷。

以上所說，各國之不能即時與中國共同對日本作戰，其形勢已經顯然，因此之故，數年以前，有人主張，中國在此期間，只有動心忍性，埋下頭來，專做必要的準備，如軍事政治經濟等等，因為和人做敵人，固然要有相當準備，才破得上，和人做朋友，也要有相當準備，才破得上，如其有了相當準備，使日本知難而退，固然最好，不然，亦可找得帮手，來拚一個你死我活，數年以來，中國所以甘于忍人所不能忍，其一希望，實在于此，然而日本決不能待至中國有了相當準備然後動手，蘆溝橋事變終于發生了，最後關頭終于到來了，中國也就只有不顧成敗利鈍起而抗戰了，於此之際，中國對於尋求與國，固然不可樂觀，對於循著國際和平路線以前進的國家，只有不斷的努力促其由道德上的同情，進而為對我經濟援助，更進而為對日本經濟制裁，更進而為對日本共同作戰，即對於路線不相同的國家，只有不斷的努力，使之不至于袒護敵人加我以危害，能由此更進自然更好，這樣說來，不是很慢麼，誠然，因為外交上進必要持久，以軍事

上的持久，來抵補外交上進行的很慢，以期待必由階段之經過，最後目的之達到，舍此別無欲速之法。

所以軍事上之持久，乃為促起國際變化，得到最後勝利之不二關鍵，軍事上怎樣才能持久呢，說來說去，只有團結民衆，近來一句流行的話，「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這誠然是格言，但是這格言如何才能見之實行呢，第一要知道怎樣才能使有錢的出錢，怎樣才能使有力的出力，第二就錢來說，多錢的多出，少錢的少出，沒錢的不出，而且使人出錢，尤須使人賺錢，因為賺得越多，出得越多，如果不使人賺錢，而只知使人出錢，則民窮財盡，第三就力來說，要有組織才能把所有之力，統一起來，要有訓練，才能使所有之力，增加效率，要有宣傳，才能使所有之力出於自動，非由強迫，否則如木無本，如水無源，軍事因之也不能持久，所以「有錢的出錢，有力的出力」，這兩句格言，看似平凡，實包含政治經濟教育乃至文學，無不在內，條理萬端，錯綜複雜之中，如果不以三民主義為之核心，試問所有政治經濟教育乃至文學，種種問題，從何解決，從何進行，從前所以痛切的說明，其意在此，如今不必再說了，今日所要說的話，綜括起來，此次抗戰，欲尋得與國，唯有軍事上能够持久，欲軍事上能够持久，唯有團結民衆，欲團結民衆，唯有實行三民主義，與從前所說的話，并無二致，不過稍稍的加以引申便了。

中國的統治抗戰與領袖

任覺五

中國目前的問題並不複雜，自從抗日戰事發生以來，所有國內的各種問題，我們可以把它歸納得很單純，很具體。第一個問題是我們怎樣去鞏固統治，這是對內的；第二個問題是我們怎樣去持久抗戰，這是對外的。沒有鞏固的統治力量，就不能發揮持久抗戰的精神，不能作持久的抗戰，我們大家就有做亡國奴的機會。所以這個問題祇有一個歸宿——寄託着中國的復興或滅亡！

許多事實證明了，過去我們各自為政，命令的不貫徹，人為主張，行動的不一致，所以一切弱點，都很顯明的在第一期抗戰當中暴露出來。這告訴我們統治的不够，和國家的不受統治，就是削弱了抗戰的力量。

中國歷史上很少有真正的統一，中國歷代的統治力量，難得有一個長時間的鞏固，春秋戰國三四百年的混戰以後，秦朝僅僅維持十二年的統一。從漢獻帝的滅亡至隋文帝的統一，其間又相隔三百七十年之久。唐太宗貞觀之治在中國的政治史上最負盛名，可是唐朝一百三十幾年中、所謂貞觀之治的也僅僅祇有五十七年的時光。北宋有遼及西夏，南宋有西夏及金的對立，元朝只維持了七十年的統一局面。明朝二百五十八年的局面

，大致可以算爲統一的有二百年。清代來了重重外患，勉強統一的祇有一百五十七年。歷史上的一治一亂，原不足爲奇，不過從春秋至民國二千六百餘年當中，可以算爲統一的時間，約占一千年，不足二分之一。爲什麼中國這樣難統治，我們可以舉出下面的幾種原因：

第一、環境太好。國無外患，因之不在武備上講求，不在科學上求進步。即使有了外患，都是文化水準比我們低的侵略者，不久受了同化，反轉被我們統治。所以中國人自來不怕外患，只是好大自由的僥倖圖存。這是中國難以統治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從心理方面來看，中國人都帶點自尊自大的個人主義心理。人家總不如我，我的一定勝過人家。這種心理演化的結果，人人想當楚霸王，誰也不服從誰，因之無論在社會上，政治上很難產生一個衆望所歸的領袖，隨時隨地形成了紊亂紛爭的殘局。又如生活方面，因爲中國得天獨厚，人人都在一個容易吃飯穿衣的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社會活着，你不必求我，我不必依賴你，各人自掃門前雪，用不着堅固的組織和團結，由此推至對民族、對國家的觀念，自然更見疏隔。所謂「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帝力何有於我哉？」足以說明過去人民對民族國家的認識。不過這還是專制時代的觀念，心目中總算有着一個皇帝，辛亥革命，專制皇帝是打倒了，一國的元勳，算是總統，可惜這個總統不爭氣，人民僅有的這一點的國家領袖觀念也一起拋上九霄雲外，忘記精光，更何

況要他去擁護和信仰一個領袖呢？可是反過來看看人家，每一個統一的國家總有他們的中心領袖，美國的羅斯福，德國的希特拉，俄國的史太林，土耳其的凱末爾，都是爲他們的人民所愛護，所擁戴的。德國民間流行着一句名言：「領袖的權威，就是國家的權威，人民應在唯一的領袖之下遂行其應盡的義務。」我們中國一般的情形正是相反，過去是如此，現在依然沒有改過來，人人自尊自大，個個稱能稱強，有了不崇拜領袖不服從領袖的習慣，這是中國難以統治的第二個原因。

第三、中國人常以地大民衆自誇，地大民衆當然好，不過在某種情形之下，地愈大，人愈多，統治上愈感困難。也就是說統治者——一國的領袖——必定要有更大的才能，纔可以完成統一統治之局。假使拿中國的土地面積來和其他國家相比，那末中國的總面積大於意大利的二十七倍，大於德國的二十四倍，大於土耳其的十三倍。再如人口方面，中國擁有人口四萬萬五千萬，比意大利的四千二百萬大十一倍，比德國的六千五百萬大七倍，比土耳其的一千四百萬大三十二倍，因之中國所需要的領袖必須十幾倍幾十倍的高出於墨索里尼，希特拉，凱末爾那樣才能的人纔可以把中國統治得住。何況實際情形又是上二段所說的，中國人不怕外患，缺乏對民族國家領袖的認識；那末人口愈多，土地愈廣，不啻增重了統治的障礙！因爲人民要有組織才可發生力量，有力量才有用處。現在試看我國的情形究竟怎樣？外人譏諷我們爲沒有組織的國家，其中自然含有故

意污辱的成份，不過，總理在民族主義中講過中國人是一盤散沙，不能團結，我國人民的缺乏組織力量，確是無可諱言的事實。譬如俗語說：「一個和尚挑水吃，兩個和尚積水吃，三個和尚沒水吃。」這雖然是一句俗語，却說出了中國人民沒有組織，不能團結的痛癢處。又如外人常說：「一個中國人沒有動靜，兩個中國人便會發生糾紛，三個中國人便成美國的保護國。」這形容中國人，寧可作亡國奴，不甘受自己的統治。這些流行的傳說就是我們沉痛的教訓。人口雖然多，但是我們缺乏組織與團結的精神，反而沒有用。再如土地面積，土地的廣大需要有便捷的交通來維繫；但是統計數字告訴我們：現在每千方公里內。中國僅有一、六二公里的鐵路，我們的敵國日本有三九·七一公里，美國有四一·六三公里，德國有一二八·三六公里。公路近年來雖然發展，可是有許多地方，還是有路無車，或者是有車不好坐，坐上去又怕中途遇土匪。在這種情況下，爲了急於求國家之統一，國防之增強，所以二十四年秋 蔣委員長才冒着危險，乘着飛機，經過初試的航空線到各邊區地方去檢閱。中國的面積這樣大，交通又這樣的不方便，統治上的困難自然較其他各國加倍的增重。人口的衆多，缺乏組織的力量，土地的廣大，缺乏溝通的工具，這是中國難於統治的第三個原因。

中國政治上的統治既然這樣不易，中國統治上的阻力又是那末深重；可是我們終於萬分艱難的情勢中，在 蔣委員長長的領導下，完成了國內的統一，發揮了統治的力量

。這不獨是歷史上的偉績，也是替我們萬千年子子孫孫奠定了生存的基礎，這個礎基再不容我們有絲毫的懷疑了，這個基礎再不容我們有絲毫的破壞了。目前的統治力量不單是我們萬千年子子孫孫的生存的基礎，而且也是我們整個民族國家復興或滅亡的界石碑。換句話說，我們擁護目前的統治，鞏固目前的統治，我們的民族和國家才有生路，我們的民族和國家一定可以復興。假使我們對目前的統治面服心不服，陽奉陰違，甚至造出種種分散統治力量的事體出來，終究逃避不了亡國奴的帽子戴到你的頭上來，除了滅亡以外沒有第二條路可以容你走，所以眼前的問題是怎樣來鞏固統治。

這次中日的戰爭，是五千年文化歷史的中華民族的存亡生死關頭，國族的前途，個人的安危，都要在這一戰中求解決，求結果。我們是被侵略的，敵人的屠刀已經加在我們的頸上；但我們每個人民都是有血有肉有靈魂的黃帝子孫，我們爲了保全祖宗的基業，我們爲了培育子孫的生命，必然的要出於一戰，斷無任人屠殺的道理。唯其我們是被侵略的目標，唯其我們是被屠殺的對象，所以我們抗戰必然出諸慎重。慎重的要素是有計劃，有準備，有持久作戰的決心，有不惜犧牲的精神，然後可以爭得勝利的一着。戰爭不是兒戲，尤其我們是被壓迫民族求自由求生存的抵抗戰。

可惜過去一般人對這一點弄不清楚，以爲祇要政府出兵，一聲喊殺，日本兵就可以倒退三千里，退出華北，退出東四省。固然我們不必把敵人的力量估計得太高，但是我

們同樣不可把敵人的力量估計得太低。人家的侵我已經有了四五十年的陰謀，我們雖然不可等待亡國後再來謀復興，但至少限度的準備不可沒有。試問在各種各樣的封建割據形勢之下，社會無秩序，國家無紀綱，國防建設無基礎，是否可以言戰？「九一八」和「一二八」的烽火，確是中華民族的危機，但我們國內的情形正是這樣糟。假使稍一檢點本身的力量，實在不能夠把五千年的文化歷史付之輕易的一擲，在這含恥忍辱的四五年中，我們的領袖蔣委員長以最大的忍耐力完成了國內的統一，以新生活運動糾正了社會的秩序，以國民經濟建設運動建立了民族經濟的基礎，以一面受人唾罵，一面以實際快幹的精神，準備了一點國防的建設，可是倭寇覺得如果再讓中國準備下去，將來鯨吞中國的機會一定太少，因此就磨快屠刀，出諸斷然的一擊。中國是被侵略的，我們的領袖早已宣言過，到了最後關頭，當然來者不拒，於是這次大戰終於在悲壯情形下揭開！從蘆溝橋事變到現在，我們的抗戰已經繼續了五個多月，各種機構上人事上的弱點，都在戰爭中暴露出來，而軍事方面，我們不諱言遭遇了小小的挫折，至此大家才覺到抗戰不是空喊口號所可生效，不是沒有準備所可倖勝。我們現在之所以能夠處處予敵人以堅強的打擊，使侵略者償付重大代價的還是有了四五年準備的結果。

我們試回頭來看一看歷史，禦侮原來不容易，匈奴是漢朝的大患，是侵略漢朝的一積力量，漢朝初年爲了內有黥布彭越韓信之亂，不能用全力來禦侮，及至外姓之亂平定

，又起了吳楚各國之亂，直至漢武帝平息外戚之亂以後，國內始無後顧之憂，至此政府始得進行禦侮，終有衛青霍去病等大敗匈奴於燕山，使匈奴不敢南下牧馬，然後班超遠征西域，大漢的威望從此遐邇聞名。又如唐代，情形同漢代一樣，高祖累為突厥所困，祇好歲致金幣布帛，忍辱和平，原因由於國內的朔方梁師都并州劉武周等都雄據一方，不受命令；到太宗時次第削平，天下大定，遂得北拓地至陰山大漢以北。這些歷史的教訓，指出禦侮必先平定內亂，也就是蔣委員長所說的「攘外必先安內」。我們現在安內的工作總算做到，可是我們的侵略者不是匈奴，不是突厥，而是號稱世界強國東方新興帝國主義。同時我們的統一工作剛剛完成，我們的準備工夫，在敵我的對比方面，遠不如當年漢唐的充實，因之在抗戰過程中有兩種現象是避免不了的：

第一種是犧牲的慘重。敵人挾其精銳的機械化部隊，在我們領土之上肆其淫威，無庸說，我們的犧牲是慘重的，我們的遭遇是艱苦的，我們的領土要被佔領，我們的同胞要被殺戮，我們的企業，交通，經濟，文化，……以至於私人的財產，無可避免的要遭受嚴重的破壞，慘烈的犧牲。「一二八」事變時，上海一隅的戰事，我們的物質損失就有十七萬萬元，現在敵人動員了百萬以上的軍隊，深入了我們的領土，我們抗戰的範圍已遍及全國，情形遠非「一二八」時上海之戰事可比，犧牲之更為慘烈，破壞之更為嚴重，不言而喻。我們的領袖在雙十節廣播演講中曾謂：「中外歷史上決沒有不犧牲而能

生存的民族，也沒有不奮鬥而可致和平的道理，如其有之，那只有自居於束手被人支配的亡國奴，才有此夢想！這次抗敵戰爭，到最後需要我們的犧牲越大，我們的責任也愈重。」這很明白的指示我們不可以徬俸求勝利，苟安求生存，欲解除痛苦，完成復興，決不是用少數的代價所可希冀。可是現在有些人遭受了一點損失，就到處喊痛苦，看到部份的缺點，就對整個的前途抱悲觀，甚至懷疑抗戰的大前提有否弄錯。敵人的力量不足亡中國，但是這種猶豫徬徨，自私自利意識的滋長，却足以葬送民族國家的命運！

第二種是初期軍事的失利。我們在上面已曾指出，不可把敵人的力量估計得太低，我們並非「恐日病」患者，但我們要沉着冷靜去觀察他人，檢點自己。我們在武力上準備是比不上敵人的，兼之我們是弱小民族，是次殖民地，我們受了許多條約上的束縛，不容許從容去建立國防，人家說我們的門戶大開，我說我們沒有門戶，敵人隨時隨地可以在我們的領土上發揮獸性！這次戰爭中敵人從東海至南海，到處作登陸企圖的就是一個明證，所以我們在抗戰初期中的軍事挫折，也不免不了的。歐戰時德國挾其精銳的部隊，深入法國的領土，不到一個月，法國的首都巴黎幾陷入敵人手中，三年中前線抗戰的統帥屢屢更換，仍是沒有戰勝的希望，後來福煦將軍抱定犧牲到底的決心，卒致衝破了四年來寸步不移的陣線。自從東南各戰場相繼失利，有許多人對抗戰前途就發生悲觀失望的心理，連聲嘆氣，以為中國的被征服這次是不免了的，眼前就要亡國。其實敵人

深入之後，在軍事上，我們立於主動的地位，隨時可以出擊，隨時可以擊破敵人的主力，敵人啼笑皆非的時候快就會到，我們軍事上的轉機也就在不久的明天。

我們不怕犧牲，因為我們要求生存，我們不怕初期的軍事挫折，因為我們所爭的是最後的勝利，我們所怕是一般的認識不清，消極悲觀，徬徨失望。這種病態心理的擴大，足以使中華民族覆亡而有餘。

建國的條件要有土地，人民和主權，復興的條件還需有優越的歷史背景，從容建設的客觀環境。可是我們從清末以後，領土是割據的，人民是渙散的，主權是分裂的。尤其是日帝國主義者沒有一時一刻不處心積慮的謀我，常用以華制華的政策，利用中國人制服中國人的手段，從中挑撥離間，使我們自相擾亂，自相殘殺；一方面收買地痞，製造漢奸，幫助封建軍閥稱兵作亂，摧毀國力。過去北洋軍閥許多次的混戰，差不多每次都有日本作後台老闆。現在我們完成了統一，日本帝國主義者正恐我們在統一中求建設，建設中求復興，不惜以武力直接來制止，甚至企圖把我們五千年的文化歷史，四千萬方里的土地，四萬萬五千萬的人口整個的鯨吞。世界上任何那個國家，牠在復興進程中遭遇到的困難，從沒有像我們這樣的艱苦。

一般人常說希特拉真是一代的豪傑，厲害非凡，他能在短期內復興了戰敗的德國。其實我們仔細研究一下，德國復興的道理並不是僅僅在於希特拉的本領大，而是人民愛

護國家，崇拜領袖，一百多年的軍國民教育種下了復興的根苗，戰後的復興正是應得的收穫。前年薩爾的投票，僑居我國的一位德國人特地坐飛機遠去祖國，投了熱忱的一票，這種精神，試問我們中國人民那個有？德國的一百多年軍國民教育是要人民怎樣去愛國家，怎樣去救國家，人人尚武，個個知兵，所以歐戰時德國雖然失敗，如今能夠不費一彈一卒的收回了喪失的主權。我們的情形又是怎樣？從漢唐以後，文與武漸漸分離，文的不知武，武的不知文，魏晉宋元之際，更助長了重文重武的風氣，文人士大夫之流羞與人爲伍，秀才挾弓矢而出，一鄉皆驚，大家都認當兵爲可恥，民間有着「好男不當兵，好鐵不打釘」的傳統心理，直到現在還沒有消除，因之一般人沒有軍事常識，沒有作戰的力量，一遇外侮侵凌，只好寫兩首詩，做一篇文章交卷。

再如意大利，也與我國不同，意大利在一八七一年已經完成了全國的統一。不過那時他在歐洲是無足輕重，而且常常被他國侵略的，所以無時無刻不在奮鬥中求生存。在歐戰以前，他已成爲歐洲強大國家之一，歐戰又給了他一個鞏固統治的好機會。當時意大利參加協約國的最大目的，希望在戰勝後分配到一些殖民地，那知和議結果，他並沒有取得預期的領土，全國上下，因爲迷信着羅馬帝國的光榮，對此都十二萬分的失望與憤慨，大家希望有一個能幹出衆的領袖來領導他們去幹，墨索里尼之所以成就的原因也就在此。還有一點主要的事實，就是墨索里尼的政治活動得到國王和天主教教皇最大的

幫助。一九二二年墨氏明白宣佈法西斯黨尊重國王的政策，他說「王朝是統一的象徵，而統一則爲法西斯主義的唯一目標。」他既在王朝旗幟底下去活動，減輕了政治上的許多磨擦。同時勾通教皇在內求得教徒的擁戴，在外得到國際上許多的便宜，自然容易收到廣大的效果。所以墨索里尼能够在最短期間把意大利鞏固強盛起來，並不是他一己的力量，國王與教皇對他的支持也是主要原因的一種。反觀我國，滿清一百多年的腐敗政治使整個中國衰弱到了極點，血盡精枯，幾乎遭列強的瓜分。這與意大利在歐戰前本爲強國的情形不可同日而語！兼之一般國民愛國心理的薄弱，反革命勢力的堅強，統一過程中的困苦艱難，當非墨索里尼的統治意大利所可比。

再次如土耳其。土耳其在過去雖然被歐洲各國稱做近東病夫。與我們的遠東病夫互相輝映，可是他們的優點正是我們所感缺乏的。例如土耳其人民篤信唯一的宗教，崇敬領袖，回教徒團結能力的堅強和入世精神的飽滿，索爲一般人所稱許。凱末爾的成功實在是得力於回教徒之處太多，回教徒的報紙一致讚揚他，回教徒更狂烈的擁戴他，他很快地成爲了革命的領袖，集中了全國的力量，所以土耳其終究在歐戰後的短期內達到了牠的獨立自由。

我們的情形既如上述，沒有優越的歷史背景，更沒有可以從容建設的環境，我們的情形不如德意志，不如意大利，甚至比不上土耳其，所以我們的復興工作要比德，意，

士幾倍幾十倍的艱苦。可是我們的領袖終究用大無畏的精神來克服牠，目前統一已經做到，抗戰正在展開，兩個大問題可說已經解決了一半，這就是領袖的偉大處。胡適之先生在中國不亡論的那篇文章裏說：「我敢說將來的歷史家會記載在這些年的國難期中，中國並不是沒有領袖，一個政府在敵人不斷侵略之下，在全國要求立即抗戰之下，爲了準備更大的抵抗力，能不對外宣戰而維持五年之久，是不能沒有領袖的，不過這種領袖和希特拉墨索里尼是絕不相同的。」本年三月間，敵國在「國王雜誌」徵求全國名流學者列舉十位現代世界上的大政治家，參加的有衆議院的議員尾崎行雄，貴族院議員德富豬一郎，法學博士高田早苗，政治學博士五來欣造，法學博士松波仁一郎，法學博士米田實，經濟學博士服部文四郎，日日新聞政治部長岩井壽郎，評論家石濱知行，著作家澤田謙等。果被舉的世界十大政治家的姓名與票數有如下列：

蔣介石

九票

墨索里尼

九票

希特拉

八票

斯大林

六票

羅斯福

五票

勞合喬治

四票

托羅斯基

二票

凱莫爾

二票

佩奈林(捷克)

二票

張伯倫等

各一票

這裏足以代表敵國第一流學者的眼光，他們也深深的感到了我們領袖的偉大。

所以我們對中國的前途絕對不容懷疑，中華民族的復興一定可以做到。第一，我們的統治沒有問題，已經完成，今後只要如何去鞏固這難得的統一局面好了，這個容易辦，大家信任政府，擁護現在的統治就成。第二，留下的還有一個持久抗戰問題，這個難關我們相信同樣的可以克服。不妨舉個例子，「九一八」事變以後全國充滿了不負責任的立即抗戰的呼聲，可是我們的領袖看得很清楚，他所執行的政策是「安內攘外」，也就是要統一了內部以後始可抗戰，現在經過了事實的證明，大家才知道不統一就無以對外。這次抗日戰事的展開，領袖指示我們「只要全國一致犧牲到底，未有不得到最後的勝利。」林語堂氏說得好：「蔣委員長更是東方一位優秀的軍事家，在中國坐鎮着這位頭腦非常冷靜的人物，他既不願意多講話，也不願意向人民解釋他自己。好像一個下棋的高手，誰也不能惹他發脾氣，他從不洩露他的步驟，他選擇自己的防綫，不讓敵人強迫着他去佈置敵人所希望的防綫，」如此，領袖有必勝的信念，也有必勝的把

握，我們還有什麼疑慮？我們還爲什麼悲觀？

我們把中國當前的兩大問題——鞏固統治與持久抗戰的來龍去脈弄清楚了以後，知道我們的責任祇有一個，就是絕對的擁護政府，絕對的擁護領袖，政府和領袖要我們怎樣做，我們就誠誠懇懇的照着做，不懷疑，不偷懶，齊一步伐，在唯一的政府與唯一的領袖領導之下共同努力，中華民族的復興我敢說就在眼前，中華民族的文化永遠照耀於全世界。

(完)

二十六年十二月爲紀念

領袖脫險在西安學生演習團講演朱霞春紀錄

絕對的愛國主義

張君勱

一個個人同國家何以會發生關係？一個人生下來的時候，偶爾生在那一國領土上，便做那一個國的人民。吾們常常看見一對爾蘭夫婦到了美國，並生下一個孩子，這一對夫婦與他們的孩子，便變了美國人民。又見一對白俄在中國生下一個孩子，或者就取得了中國國籍。有人生在某國境內，便同他生了很密切的關係，有人生在某國境內，並不發生密切的關係。可見國籍不一定發生各個人對於國家之情感，而對於國家之情感，另有一種很深厚的根據。況且吾們看見同一國內之人民，其愛國心之深淺，大大不同，可見國民愛國之義務雖同，而所以實行其愛國之義務，則因個人之性情而大異。

現在吾們討論一個問題，就是吾們所以愛國，是否因為國家給吾們以好處或利益。一派的代表，就是英國之休謨，邊沁等。他們的意思，以為各個人所以服從國家，是為有國家便能得到幸福，無國家便要受許多痛苦這一派可以名曰功利主義之國家觀。同邊沁等反對的一派，就是精神主義之國家觀，他們以為國家之存在，根於人類精神上之需要，各個人之愛國，根於各個人道德上之義務，猶之各個人之守法或遵守道德規則，自有其良心上之根據，初不為有利可享有害可避之故。

在吾們日常生活中，覺得這兩派學說，皆有相當根據。譬如吾們說到一國人民痛苦不堪之狀，此等人民背主事讎，到了外戰時候，他們變成奸細，做他幫敵人害本國的事，於是吾們嘆一聲氣說：「政府要人民愛國，必須其國家平日真有令人可愛處，換一句話說，真能與人民以利益以好處。譬如官吏之廉潔，法律之保障與夫天災人禍之減少，皆為使其人民安居樂業之最要條件。如其官吏貪污不堪，法律可以任意顛倒，則人民一身之私計且不暇顧，何能在戰時激發其愛國之公心。所謂功利主義之國家觀，在這個範圍以內，是有根據的。這個學說之結果，不外說政府如愛人民，人民自然亦愛國家。這種學說在平時是很對的，在平日無事之時，國家有他的領土，有他的人民，政府在其領土內，在其人民身上，施行種種善政，以免除人民之痛苦，人民自然愛戴。這種學說中自包含很重要的真理。

但到了國破家亡之日，領土已喪失，人民已變為戰勝者之奴隸，政府要施行善政而已不可得，政府要給人民以利益而亦不可得，這個時候是否吾們愛國家之義務可以中斷？因為照功利主義之學說，有利益可得才愛國，那末無利益可得，國家便不須愛。如此結果，愛國變為商業行為，而非道德上之義務了。在精神主義之立場上，國家本身由人民團體生活之要求而生，本不單單為給各個人以利益，所以平日之愛國，本為道德上之義務，及至國破家亡之日，尤其應該發揮其至高尙之義務，而盡其救亡圖存之責任。因

此國家亡後，而吾們愛國之義務仍不能中斷。可見吾們平日所以愛國，並不是為從國家手中得好處，而是盡吾們道德上的責任，那末愛國之義務，是為盡責任而不是為得好處，是絕對的而不是附條件的，這就是吾所謂「絕對的愛國主義」。

以上兩派學說的比較中，可以見到國家之運命，不單以有形界內存在之日為止，乃至在有形界內並不存在，而在精神界內依然可以存在。其國民對於此種國家，並不以其在有形界中不存在之故，而減少其愛國之心。因此尤見得國家之性質，不可以有形的利益來說明，而應求其根據於人類之精神了。吾們知道波蘭這個國家，經俄普奧三國三次瓜分，而後波蘭終於滅亡。波蘭這個國家在地球上消滅已一百多年，到了歐戰中，波蘭又復成爲一國。這個波蘭之復國，他們的領袖伯德符斯幾氏之功績是很偉大的。伯氏的幼時生長在波蘭，他的故鄉是爲俄國所佔據。他幼年在本國學音樂，他中年拿他的音樂表現於英法美各國，呼醒世界人對於他個人同時對於波蘭民族之尊敬。可以說伯氏到處演奏波蘭的歌謠，呼起了各強國對於波蘭之同情，而隱隱然成了一九一四年後波蘭復興之根本。我現在拿伯氏的故事，說明國家之存在不限於有形界之理由。他有一年在英國奏樂，英女皇維多利亞親自到場，他的盛名已達到各國帝皇之耳中，俄皇尼哥拉二世亦請他奏樂。請貼中有一語說「俄皇陛下深喜此有名之音樂家爲俄國籍」。伯氏毅然答覆曰：「俄皇陛下錯了，我是波蘭人」。伯氏且拒絕奏演，此事幾乎鬧了大風潮。於是俄

國音樂家出而調停，請伯氏重加考慮。伯氏爲免引起自己一身上的波瀾，仍舊在俄宮庭中奏演。我請大家注意的，就是伯氏這句「我是波蘭人」的答案，波蘭已滅亡百多年，而伯氏依然說「我是波蘭人」，這是何等氣魄！何等對於祖國之熱愛。況且在他統治國俄皇之前，敢說此語，尤其令人佩服不止。要知民族與國家之最後根據，就在乎國家民族倒臺之日，而依然有人敢說「我是某國人」。這就是民族生存之最後根據，不在有形界而在無形界之最大證明。惟有此精神，而後無形界之民族存在，不移時後可變爲有形界之存在。

伯氏於一九一〇年遇到波蘭戰史上戰績五百週年之大紀念，作了一長篇之譜樂曲(Symphony)第一段寫波蘭故鄉之風景，第二段寫夢想中之自由，第三段寫他心中救亡之努力。第一段中有下列語句：

上帝！你以你的大力假給波蘭，

等於嚴父之保護稚弱，

在長久年代中，

你使波蘭在歷史中享有榮譽。

今在你祭壇前歌唱一曲，

願上帝使吾所愛之國還爲自由之鄉。

至慈祥之上帝！你之大手掌中，
剷除暴主之毒計，

維繫吾輩貧賤者心中之希望。

今在你祭壇上歌唱一曲，

願上帝使吾所愛之國還為自由之鄉。

在第三段中更有下列語句：

波蘭！你永久在慘痛中，

作仇人之奴隸嗎？

吾輩對於援救工作，

還有絲毫躊躇之意嗎？

波蘭！你放心，決不如此。

以上詩句中，可以見國家在有形界中已不存在，而仍可在無形界中存在。國家之所以維持人心，不因其政府所給與之利益，即在愁痛慘苦之中，而仍舊在其國民心坎中，占有牢固不移之地位。這是伯德符斯幾所表現的實例，最值得吾人效法的。

更有一點，吾要說明的，就是國家民族之所以存在，不僅賴乎有形的基礎，如土地，人民，與政治。而文化上之成績，尤為緊要。因為一個民族在世界歷史中占地位

，就是因爲他有成績之故。譬如各省人士來到廣西，定要問廣西在歷史中有何著名人物，大家每以石達開，唐景崧等對。再問廣西有何出產，本省人定以桐油錫鎊等產物爲對。此人物此產品卽廣西對於中國文化中之供獻。推而廣之於一民族，其例正同。問到希臘在歷史中有何表現，大家必以希臘哲學，科學，美術等對。問到羅馬如何，必舉羅馬法與大帝國之組織對。卽以近代各民族國家論，所要求於各民族國家，如英法德等亦復相同。問到英國之成績，大家必以憲法，議會與海權等對。問到法國之成績，大家定以法國革命歷史與盧騷，笛卡兒等以對。問到德國，大家舉俾士麥之政績與康德等之哲學以對。可見凡爲偉大民族，必對於世界有貢獻。偉大民族之一部歷史，等於一家之家祀，曰高祖如何，曰曾祖如何，曰祖如何。世世代代能繼續下去，此家必爲一鄉中顯貴之家。到了某代出了不肖子孫，賣古董，賣藏書，乃至賣田產，則其人定爲鄉里所非笑。吾們中華民族現在似乎到了這一類的末代情況。但是吾人不要氣餒。世界上民族之忽興忽亡，固不足奇，如波蘭，捷克，皆是亡而後興之民族。吾中華民族在世界史上非無所供獻之民族，目下一時對外抗戰雖有挫敗，然敵人之力定不能把我一口吞下了去。吾國全民誠如伯德符斯幾氏，咬定牙根說：「我是中國人，吾們都是中國人」：不因敵人之威迫而屈服，不因敵人之利誘而屈服。吾相信中華民族是不會滅亡的，吾相信今日之痛苦，卽爲民族復興之張本。

現在我可以作一結論，所謂「絕對愛國主義」其內容有五點：（一）人民之所以愛國，不是爲自國家手中得到好處或利益；（二）即在國破家亡中，不特無好處可得，反而有害處可受，而愛國之心應仍舊絲毫不減；（三）不因強者戰勝之故，輕易受人威脅而背其祖國；（四）在國破家亡後之愛國心，卽爲民族復興之根據；（五）所以愛國，不是爲求國家之酬報，乃是行其心之所安，現在吾國正處山河破碎之日，各地方人民爲一時之求利害，往往有遷就敵人之行爲。吾勸全國人民睜開眼睛，爲全國利害打算，爲四千年之祖宗打算，大家惟有確信絕對的愛國主義，乃能保持民族既往之榮譽與今後之生命。（大公報）

抗戰中之黨派問題

陳銘樞

戰鬥週報社頃又以黨派問題徵文於我，並列出如下諸項目：一、國民黨的唯一性問題；二、國民黨復興問題；三、在野各黨派法律地位問題；四、抗戰中在野黨派存廢問題；五、各黨派活動範圍問題；六、未來黨治問題。這些問題太重大了，淺薄如我，恐不能作正確切當的答覆，且期限甚迫，不及作縝密的思慮，本不敢應命，重以該社特托友人某君函請某君電話見囑，像這樣殷勤盛意，實難以推却，只好把個人所見得到的坦白誠懇地寫出來，不遑顧及其確切與不確切了。希望大家指教。寫本文之前，要將我的政治態度和立場申明一下：我和若干位朋友每對政治有所談論，必言不離宗的提出「鞏固統一抗戰到底」八字，我個人曾應掃蕩報之囑將這個作題目寫過一篇文章，這是我們主張的唯一原則；本着這個原則，無論在內在外對公對私却打開窗子說同一本旨的亮話，司馬君實說「無事不可對人言。」我想這句話真是中國這個時代的寶鑑，人人都當效法的。這是我們精神上的規律。至於我的立場，如大家知道的，我是一個老國民黨員，我是二民主義的信徒。但是也如大家知道的，我曾經一度離開國民黨和多年的長官蔣委員長。我和許多朋友曾經組織了一個團體，名為中華民族革命同盟。我願意坦白的說，

這一段歷史無論在個人，在國家都是一件不幸的事。但我也必須堅決坦白承認，我沒有一天拋棄三民主義的信仰，至少我個人主觀上是這樣自信。但民族革命同盟之惟一目的，就是促進全國力量之集中對日抗戰。所以在抗戰發動以後，我們認為我們的民族革命同盟抗日的希望既已實現，則今後的努力就是參加和擁護抗戰到底，爭取最後勝利。而這是全國同胞一個總目的。所以我們自己的組織也就可以解散。所有舊日同志各個為抗日而努力。而我當然也就回復我國民黨的地位。所以我現在是站在國民黨一個黨員的立場說話。

九一八以來全國都抱定抗日救國的決心，這決心，只有緩急之分，決無原則之異。「不分黨派停止內爭一致聯合起來統一於抗日戰綫之下」——擁護中央發動抗日戰爭」等等口號，數年來不是充滿了全國嗎？果然，中央發動全國抗戰了，除了漢奸們凡血氣之人無不歡忻起舞齊集於政府抗日大纛之下各黨各派聚首一堂了，國民黨的政府，黨的最高領袖——全國唯一的領袖領導起來抗日，發揚三民主義的光榮，實行總理的政策——遺教在本黨以外的一切黨派衆口一辭這樣說，連血戰十年極端不相容的共產黨亦宣言擁護三民主義了。從抗戰的事實所表現，國民黨已經居於唯一領導抗日的地位。我們回想首都南京未陷落以前許多朝野人士在文字上和談吐中所流露一種極自然的同感之一句話，即是：「民國開元以來所未見之大統一大團結的好現象」。在那個時候誰都以為共同

奉命抗日的民族革命最高原則之下，黨派的政見不會發生磨擦，且誰也不願看見這種磨擦，那末，黨派論爭的問題，不是不應該有的嗎，在南京時無有，反而退守到武漢才有，不應該有而竟有，這是甚麼原故？假使我們軍事不失敗，東戰場至今仍保持在淞滬線，南京不陷落，太原不失守，河北不放棄，乃至一帆風順，使倭虜氣竭力蹙而遁逃，則這種磨擦當不易發生，亦不成甚麼問題。可是，軍事失敗，疆土短縮，一般看不到抗戰最後勝利之基本力量，和必向着的光明前途在，便慌於戰爭初段或過程中所不能免的失敗而動搖而徬徨而恐懼，直至不知不覺間忘却了共守的抗日唯一最高原則，轉過頭來，爲自己的集團打算了。既萌了這個私的念頭，便不能不打他人的主意了。黨派論爭的問題是不是從這種心理而起的呢？倘我們的觀察是不錯，我今設個譬喻以證明這種心理是應該，抑是謬誤。譬如有股大強盜攻犯我的鄉里，要隘佔領去，或某碉樓攻毀了，爲子弟們紛紛起而責難家長——族長——鄉長，怨他們招恨於匪，他們平日薄待子弟，不早聯結守望相助的鄰里，不事先充實守禦，怨望之餘，一面各作逃生之計；而爲家鄉里長們徒悻悻然恨子弟之不齊力，疑子弟之生異心，而不思披肝瀝胆，激勵鼓舞，動以公義，示以死中求生之道，則怎能免覆家亡族的劫運！要知外患愈深，內部的團結愈須堅固；敵人愈打來得兇猛，擁護首領愛惜手足愈須熱烈周到，現在不是外患愈深，敵人愈來得兇猛的時候麼，公忠愛國的同志，那有工夫來論爭黨派的問題！

然而，不應有的問題竟然有了，問題既已發生，徒然太息是無用的，袖手傍觀更不應該的，我們應當解答問題。不僅解答我們應當解決的問題。古人有句歷史極沉痛的話「敵人業已渡河而朝論尚紛紜未定」目前陷落這種緊迫的形勢，豈有時間允許紛紛之論？然因為有紛紛之論，所以自然會引起本黨——國民黨的唯一性問題來了。何以謂為唯一性？申言之，近年來國民黨正準備結束訓政時期，渡入憲政時期，在這個將渡未渡之間，忽臨了對外決國族生死存亡的長期戰爭，應如何統一一切思想，意志政見，集中一切人力財力物力智力於中央，且掌握於最高領袖之下，俾靈活運用政權與指揮軍事，方能勝敵圖功。那末，則再無有善於一黨專政了。即不特不宜渡入憲政，且宜回復完全訓政時期。甚至到一種新軍政時期。所謂唯一性，是不是這個意義？站在那一個黨的人們都不免的，要自己的黨得權勢，愈大愈好，以至祇有我自己一個黨。我是國民黨人，當然主觀上亦是這樣想。即就客觀而論，以目前的形勢之險惡如此，果能全國祇有一個黨，不是最合了前說的勝敵固功的條件麼，更何至於有紛紛之論——黨派的爭論？但是，儘管主觀上是這樣想客觀上亦是這樣於目前形勢有利；而各黨派間歷史的已成的事實——亦是客觀的事實，是否無須乎檢討？

我想擺在目前的，毋庸解說，許多人都看得到罷！我姑不作檢討，而不能不提出一種歷史的教訓和未來推移的警惕，這是甚麼？即：假使我們祇要完成唯一的本黨而不許

其他的公開存在，事實上牠仍秘密存在，我們將何術以防止牠，這不是已往多少年經過無限的血的教訓嗎？即幸而在這對外抗戰的時期是愛國的團體都應該捨其所私而貢獻於公可以勉就我們之範，不知秘密存在之害實十倍於公開存在，然則未來推移之可警惕，不又是極顯然的嗎？這種可慮的事件，不容輕易忽略的，我們須盡忠澄慮為國族謀為本黨謹慎勿蹈已往的覆轍和貽來日的大憂！

上文說過，現在國民黨已居於唯一領導抗日的地位，任何人所不能否認的既形成了唯一的地位，本自不衰，何以尚發生「國民黨復興的問題」呢？既云復興，當然感覺許多空乏，許多缺點；當然要另有積極的方針，作彌補挽救和健全的建樹；這才是本黨本身真正問題。只要我們能居本身切實檢討不自寬假地發憤努力積極整刷發揚光大自己，不特可以長久鞏固唯一的領導權，甚至於將達到完成唯一的黨的願望。若不圖健全充實本身積極領導全國民衆，而所有空乏，缺點，甚至錯誤都要掩飾下去，反過來對黨外只做防拒的工作，這是自暴自欺的萎性心理！這是自壞長城的勾當，我想我們決不會有此。萬一不幸而有此，則不特不能阻止他黨之發展，連自黨的前途亦將自劃了。因為從古至今未有單消極的防別人而自無積極的作法所能長在啊！上兩個一正一反的意義，乃是事理上所必有之推論，凡屬一個黨員不可無這樣的反省警惕心理，更不可無這樣的奮發為雄的精神；不然的話，我們所舉出的「復興問題」當有何意義呢？所以我們必須一

而反省警惕，一面奮發為雄，復興大業，端繫於此，亦正是我們最切實最根本的問題。我們正因有對國家民族負責的偉願，便應更責己更嚴。

上面對於國民黨唯一性的問題和最根本的復興問題概括地說了許多話。對於（三）（四）（五）項問題，可無須乎詳論，茲就這三項連着第一項問題作一點意見提出：我以為對於本黨以外黨派存在問題最善處的方法，應為：

（一）國民黨自身積極起來提出鮮明的抗戰綱領和表現堅決的抗戰行動；一面統一黨的意志，消滅黨內派別鬥爭和改進黨的組織，提高黨的真實威權。

（二）國民黨以外之黨派如能支持國民黨政治主張而自願解散組織者，國民黨固應歡迎；即不願解散組織而誠意支持國民黨抗戰主張擁護政府抗戰政策，亦可任其存在。只有法律問題，沒有黨派問題。

（三）為鞏固團結，加強抗戰力量起見，政府雖不必一定要開放政權，召集議會，但應集中全國各方面人才於政府機關。或者也可以說，只問人才，不問黨派。

我寫下這三點意見尤其寫到第二點時，不禁又引起我前舉的「鞏固統一抗戰到底」八個字的唯一原則和精神上的規律底話頭來了。我所謂「鞏固統一」者，不僅在目前所需要，乃至長期所需要；不僅在抗戰時所需要，乃至抗戰後建設真正獨立的民族國家所需要；並且在抗戰經過愈危困國土愈蹙形勢愈險當中，越發需要——加緊的百千萬倍的

需要。因爲不然的話，我們試瞑目一想：倘愈在危險中而不能愈團結，愈不能緊緊維繫住成爲整個陣線跟着統一的唯一的領導之下去應付益肆兇毒殘忍狡滑無倫愈入愈深的敵人，則其禍害之嚴重，比諸任何不滿意——失望之事，實超過百千萬倍！那末，我今對於各黨各派連一切的有實力者在內舉出兩條規律作衡量的尺度：

一、不僅不因形勢愈險惡而動搖，徬徨，恐懼，而失望，懷怨，而別萌私見；且應該因形勢愈險惡而降心相從上下相諒內外相通，而加緊鞏固統一戰綫，即更加形成一心一德擁護政府擁護最高領袖。

二、在形勢愈險惡當中，如有別爲自己團體打算逞其私圖者，即是要負破壞統一分裂抗日戰線和危害國家的責任。我相信凡屬一個光明立場的政治黨派都會想到這種責任——罪名的。倘不願到這種責任而打私的主意者，必將自絕於國，自絕於民衆，自絕於自己黨派的生命。

上舉這兩個尺度，我望本黨必先拿來衡量自己，也望其他一切黨派的人拿來衡量自己，也望各方面負責人士以及全國同胞拿來衡量自己。

至於將來的黨治問題，我想是更容易解決，任何人沒有異議的動了本黨完成了國民革命的使命，到了憲政時期，自然還政於民。但這自然不是說本黨將棄其對國家的責任。只要本黨能繼續領導全國得到全國民衆的擁護，本黨當然還是在領導地位。我敢說一

句：只要本黨能不離開民衆，民衆一定擁護本黨。只要本黨能自強不息，本黨總是國家民族的中心！

抗敵大團結的根本意義

陶希聖

今天的偉大氣象，爲日本軍閥忌視仇視的氣象，是國內各黨派各階級的大團結。如中國青年黨，國家社會黨，中國共產黨，中國社會黨，以及無黨無派的各種團體，各界領袖，都在三民主義的旗下，一致團結，抗敵禦侮。這個大團結，以抗敵的軍事爲最切迫的動機。但是他的意義決不止於軍事一方面。外交政治經濟各方面的政策，都已有共同的認識，或者還在需求共同的認識，有了共同主張與共同行動的團結，才算得真實的團結。如果大家只是爲軍事的作戰而團結，固然不錯，却是不夠。如果大家只是爲了戰事，那末，戰勝就爭功，戰敗就分手。這在軍事力量比較薄弱的中國，對於暴日堅苦作戰的民族行動上，豈不是一番笑話。這種笑話，裏面包含着可怖的矛盾，足以使中國亡國而有餘。如果大家只是認爲政府有了足以領導抗戰的軍事力量，才來團結，固然不錯，却也可悲。大家須要知道，這個政府是中國民族的最後的政府。這點力量是中國民族的共同的力量。這個政府的失敗和滅亡，就是中國民族的失敗和滅亡。在日本軍閥手下滅亡了中國，至少一百年以上不能翻身。

全國各黨派各階級的團結，至少，有三個問題要加解釋。第一是大家爲什麼要團結

起來打仗。第二是大家怎樣的團結起來打仗？第三是大家要打出一個什麼收穫來？我們現在依次序來解釋。

大家爲什麼要團結來打仗？這個問題的解釋，在三民主義的第一個主義，即民族主義。民族主義的一個意義，是國外民族一律平等。爲了世界各民族的平等與和平，爲了中國必須打仗。在今日，世界上有一種國家，要打破國際的平等與世界和平。如日本就是其中最猖狂的一個。他要征服中國的民族獨立精神，要佔領黃河流域的土地。還有一種國家是要維持國際的平等與世界和平的。如英法美蘇。他們有的是爲了自己的經濟復興，有的是爲了散布在世界各處的殖民地的保守，有的是爲了社會主義的建設。無論怎樣，他們都是需要和平的。中國現正受一個要打破世界和平及侵略中國的領土的國家以軍事來侵略。中國的民族獨立及領土完整，只有與世界上愛護和平的各國相互連結起來。中國國民黨五屆中央三中全會的宣言上面說過中國政府要走國際和平的路綫。這次抗日軍事，就是這個根本政策的一個表現。我們要從國際的和平壁壘及集體安全裏面，打出民族獨立的一條血路來。我們的打仗也就是要保持國際和平的壁壘與完成國際的集體安全制。如果中國分裂或是滅亡，那些要打破世界和平的國家，便要氣燄萬丈，實力高漲。這樣一來，世界上就沒有一隅，可以得到和平。我們不能想像到中國分裂或滅亡以後，世界愛護和平的國家還有一個能夠保持和平。愛護和平的國家爲了這一點。都來維

護中國的完整，支持中國的抗戰，幫助中國取得永久的和平。這裏面含了偉大的意義，正確的政策。軍事行動雖然是主要的方法，却不過止是其中一個方法。

全國各黨派各階級怎樣團結抗敵，這第二個問題的解答，就是三民主義。今日的中央政府，以民權主義來求得各黨派各階級的大團結，這個基本政策，正是大家所由團結的方法。

民主政治制度，是一種鬥爭，又是一種組織。在民主政治之下，各黨派各階級可以充分拿出自己的主張來求得選民的擁護。這是一種鬥爭。但是，歐美的民主政治是和民族國家一并發達起來的。歐美民族國家並沒因為民主政治的發達，四分五裂，割據自雄，所以說民主政治又是一種組織。歐美各國，在一到戰時，大家就團結起來了。只有革命能夠發展為內戰。只有革命有時乘對外作戰的時機發動起來。不過，革命乘戰時發動，在侵略別國的帝國主義國家是合理的。在一個侵略國裏，統治階級及執政黨，使因革命而倒壞，被治階級及在野黨還可以自存自立為一個國家。如果在一個受軍事侵略的國家，就不是這樣了。滅亡了的國家，是沒有一個黨派沒有一個階級可以不倖亡國奴的。我們中國的今日便是後面這個情勢。我們很難想像到國民黨被日本打倒以後，還有一個能夠樹立完整國家及領導全國抗日的黨派可以存在，除非他是漢奸，他決不能存在的。我們也難想像到日本占領中國土地以後，資本家和勞動者有一個階級可以自由生活自由發達的。因

此大家在日本軍閥侵略之下，漸漸的化仇爲友，團結起來，團結的方法，就是民主制度。

這個民主制度與十九世紀歐洲的民主制度不同，這個民主制度是在世界的民主國家正受侵略而世界的和平秩序正受威脅的時代，爲了集中權力而構成的。這個民主制度，不是一種鬥爭，乃是一種集中力量的組織。

第三個問題，即各黨派各階級要打出一個什麼社會來？這個問題的解釋，在於三民主義的第三個民生主義。民生主義是反資本制度的。但是民生主義不主張用階級鬥爭的方法打破資本制度。在一個先進的資本主義國裏，不用階級鬥爭，沒有方法可以打破資本制度，但在帝國主義侵略下的後進工業國如中國，在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戰爭中，可以打破資本制度，構成社會主義的國家，而用不着階級鬥爭。爲什麼呢？國家現在有銀行資本及交通工具以及各種重工業在手裏，一般工業農業只有依賴國家的資本和交通才可以存在和發達。這些工業農業，在抗戰時期，又必須在國家的作戰計劃之下，才可以存在和發達。他們漸漸化爲完全附庸于國有事業的附合物。這種社會組織，雖還不是社會主義社會，已向社會主義前進一步了。

這三種基本政策，在現前是最低的理想，也就是最高的理想。是這樣才可以延長抗戰，取得民族的獨立。是這樣才可以渡過戰後的恐慌。這樣才可以渡過戰後的恐慌。是這樣，也可以打出一個有計劃的生產的社會來了。（二十六年十月二十三日掃蕩報）

關於民主政治

葉青

在抗戰前曾有過一個專門從事民主運動的刊物。抗戰發生，這個刊物就停止了。但在幾個月之後，又出現了民主底呼聲。在西安，叫得很響亮。其次為漢口。此外的地方亦有不少的應聲。民主於是成爲抗戰中的一個問題。

主張民主的人，以爲抗戰需要民主。理由是：華北軍事上的不利，救國公債底難銷，農村之未援助的抗戰，人民之未熱烈助戰等『缺陷』，都由於『中國不是民主國家』的緣故；所以要獲得勝利，必須實行民主；只有民主的政府纔『讓人民自動武裝起來，准許民衆自動參加抗戰』；『只有用民主的方法纔能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來支持抗戰』。於是他們主張『民主抗戰』，反對『獨裁抗戰』。

這些主張民主的理由，依我看來，並不是爲着抗戰，假如真是爲着抗戰那就沒有一個能够成立。華北軍事上的不利，是華北未被中央統一的結果。這在『抗戰底根本問題』一書上有詳明的分析。救國公債底難銷，一方面由於宣傳工作不够，一方面由於逃難者多，有好些錢變成逃難費用去了。農村之未援助抗戰和人民之未熱烈助戰，乃過去民衆運動底缺點使然。在教育未普及以至文盲很多不能閱報讀書的情形下，加以前述缺點

，民衆根本沒有自動參加抗戰的意識。如果有之，像救護傷兵、捐輸財物、協助軍隊一類事，雖專制政府亦不會阻止。但像自動武裝起來一類事，那就是民主政府亦不能准許。世界上曾有一個民主政府給與民衆以自動武裝之自由的嗎？而抗戰對於民衆所需要的軍事上的參加，是在政府指揮下之有計劃和有組織的方式，如所謂徵兵制度者，絕非陷於無政府狀態中的自動武裝起來，自動參加抗戰。至於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的方法，不限於民主。俄國之參加歐戰，不是用沙皇專制的方法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的嗎？意國之征服阿比西利惡，不是用法西斯獨裁的方法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的嗎？日本這次侵略我們，是動員了全國一切人力物力的，然而主張民主抗戰的人把它底政府詆爲法西斯軍閥獨裁，不又足見法西斯軍閥獨裁的方法亦能動員全國一切人力物力嗎？所以抗戰需要民主之說不是的論。把過去幾個月抗戰底缺陷歸因於不民主，更是錯誤。意國與阿比西尼惡作戰的勝利，難道是它行了民主政治的緣故嗎？勝利與民主沒有必然性的關係。

老實說，站在抗戰需要上，當前的政治問題，從中國底情形看來，應以強固中央政權爲急務。很明顯的，抗戰所最需要的軍隊，政府還沒有完全統一其軍政軍令的能力。有些省區，政府底命令不能到達或完全到達。這在作戰上和動員上妨害很大。華北軍事上的失利，不就是軍政軍令沒有統一的結果嗎？所以完成統一之關係於抗戰比實行民主

緊要得多。

敵將松室孝良所唾罵的這句話：「中國實力派大部份採取個人或小集團的繁榮主義，缺乏爲國爲民觀念」，正是對着我們底不統一的情形而說的。我們應該趕快完成統一，使那些與政府對立的實力派，不單是正規軍方面就是游擊隊方面，亦同樣嚴格地接受命令，辦到政府對於軍官能够自由調動、自由整理、對於軍隊能够自由編制自由調遣。所以完成統一，是抗戰底迫切需要。

而完成統一，把中央政權強固了，對於民主就是部份的實現。民主以中央集權爲制度，強固了中央政權，地方政權必然削弱，這還不是中央集權底實現嗎？抗戰時期所能實行的民主，只能到這個境地。

此外如選舉一項，是辦不到的。戰區底民衆有很多在敵人底統治下，有很多到處逃難流離失所的。後方底民衆因躲避敵機，亦有很多到處逃難流離失所。此外沒有逃難的人則忙於救濟難民、看護傷兵、募集財物、加緊訓練、應徵應訓等事。並且還應該加緊生產以發達抗戰所需要的經濟基礎。這那裏有時間辦選舉？選舉並不是簡單的，輕易舉的事情。

至於自由一項，現在總有相當的獲得。其實在中國這種被壓迫以國度，民族底獨立重於個人底自由。須知從來自由主義盛行於英國，國家主義盛行的德國，不是沒有原因

的。而在抗爭時期，尤談不到自由。歐洲大戰中各國人民，就是民主國底人民，一切都受統制。而且不這樣，戰爭無法進行，勝利更談不到。民主在實際上不存在了，至少是不完全存在了。

所以在抗戰時期要求實行民主，是既不懂戰爭爲何物，又不懂時局爲何狀的。目前的重大問題是統一軍隊、整理軍隊、同時還要統一意志、訓練壯丁、整理保甲。此外的一切，全都應該爲着軍事訓練軍隊，服從軍事。抗戰是戰爭，有關民族底生存。何況「抗戰目前正處在一個嚴重的困難關頭」呢？先生們，不是平常時代了，現在是非常時期，戰爭時期！

在這個時期中，我覺得軍事高於一切，而軍事與民主有不相容性，所以我願意爲了軍事暫時不談民主。你如果不相信軍事高於一切，請問；上海失掉了，你還能在上海談民主嗎？假使軍事上再失利，把漢口失掉，你還能在漢口談民主嗎？那時你之離開漢口往重慶跑，不同你從前之離開上海往漢口跑一樣嗎？老實說，假如將來再一失利，你連跑的地方都沒有了，民主云乎哉？

確實，今天要求民主的人，在社會構成上，都是一些在幻想中過活的小市民。他們不管現實，就在「事已急迫萬分」之時，亦要追逐幻想。從前希望在由封建到資本的階段實現社會主義，現在希望在與敵人作戰到十分激烈亦十分危險的時期實現民主政治。

這真不愧是有階級！

並且在幻想中過活的小市民，根本沒有科學的思想，所以不能認識中國實行民主的過程及中國民主底特質。假如有，就可知道在中國爭取民主的是國民黨。它爲了完盡這個任務，曾與封建政治爭鬥多少年，到辛亥纔推翻滿清，把中國變成了一個民主共和國。民主運動底歷史意義和偉大意義，在這個時代，國民黨已經做過了。

你們現在的，民主要求，乃是對國民黨要求。這裏，你們却沒有懂得現在的政治並不是封建的，所以政權不在貴族手中或君主手中而是在國民黨底手中。國民黨不是貴族，乃是人民底政治團體，以代表全國人民自任的。他以民權主義和五權憲法爲旗幟。而他之取得政權，是用革命手段從封建勢力方面奪過來的。俄國革命後由唯一的黨永遠掌握政權的事，更給以新的教訓。所以國民黨掌握政權是中國民主國革命過程中的特殊形態。這是不可忽視的一點。至于國民黨之不像俄國革命後那樣實行選舉，可從孫中山先生底軍政訓政憲政二階段論中求得解答。那裏而包括有革命中的專政需要，中國底民族運動，人民底智識程度和辛亥後的選舉經驗種種。但國民黨是民主黨，所以有實行選舉的決心。若不是抗戰發生，國民會議已開，憲法已制，而且將從此時起逐漸走上憲政時期。

所以現在的民主要求，是對國民黨要求，並沒有歷史的意義和偉大的意義。而對國民

黨要求，乃是黨與黨爭政權的意思。這不外說，國民黨一黨掌握政權，我們沒有份，應該分點給我們。這顯然是爲了黨派底利益。如果說不然，那就要把一黨掌握政權看成不民主的才行。然而這何解于蘇聯今日底民主？蘇聯今日底民主，是很新的，但除開共產黨外不允許別黨存在，甚至同黨內的派也不能存在。因此，國民黨依它底辦法實施憲政，你不能說它不是民主。它既是民主，那末你之向它要求民主不是要求你自己底黨分得政權還是甚麼？

關於自由，也須說幾句。國民黨因爲沒有實施憲政，所以人民所享受的自由還不充分。但只能說是不充分，不能說是沒有。而且我還可說凡是順着由封建到資本這個階段走的人，都享有相當的自由。只有向着超于這個階段走，甚至採取打倒式的人，才沒有自由。然而不是完全沒有，一九二八年以來所出版的異於三民主義思想的書報，並不算少。就是在昨年以前罵在民黨和國民政府爲漢奸的刊物，依然能够出版。然而在很新的蘇聯民主下，則不能這樣。足見國民黨所不與別黨的自由是暴動自由和謾罵自由。所以今天向國民黨要求民主的黨是爲自己要求，并不是爲一般人要求。只有它才需要暴動自由，謾罵自由，並且還需要保存一種軍隊的自由，保存一種區域的自由。

但是從中國底歷史階段看來，應以創造近代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爲任務，簡言之，是創造一種國家制度的時代，負有這種任務的國民黨，當然不能允許別黨有那些

自由。而在目前的抗戰時期，爲了集中力量鞏固後方起見，領導抗戰的國民黨，同樣而且更是不能允許別黨有那些自由。所以不論怎樣，中國此時所要求的都是：一個統一的國家，一個統一的政府，一個統一的軍隊。因此，不僅國民黨要反對別黨有謾罵自由，暴動自由，保存軍隊自由，保存區域自由；就是人民，也要反對別黨有謾罵自由，暴動自由，保存軍隊自由，保存區域自由。我們不應該讓任何黨以自由之名來分裂國家組織，分散抗戰力量。

一個黨爭取自由，不站在歷史底立場，人民底立場，而僅注意自己國派系底利益，根本沒有價值。我說爭取自由者口中的自由，是派系底自由，不關於人民，他們必然不會心服。但是實却是這樣。要証明這點，有一個很好的例子。他們常常要求言論自由但到他們一獲得了時，便不許別人享受。我只因爲發表了「長期抗戰論」等文，在籌集抗戰經費和分析國際情形上提出一點稍與他們不同的意見，他們便造謠誣害，說我是托派，匪徒，漢奸，並捏造證據，說我「在上海」，「敵人領事館取得聯系，共同商確，領取津貼，出版反共的破壞統一戰線的刊物」，「請政府「逮捕」」，「以危害民國緊急治罪法及處決漢奸敵探之軍法嚴厲地處治」。這不是黨中底言論自由的證明嗎？老實說，他們底黨還沒有在朝，便這樣地不許人家說異於他們所說的話，那末在朝後除開他們有言論自由外，誰還能有的呢？

這一切，便是他們向國民黨要求民主的真意。說抗戰需要民主，乃是一種口實。而且那也不過因爲在抗戰要求民主是一個很好的機會罷了。（二十七年一月十二日掃蕩報）

關於政治黨派

葉青

哲學上有黨派，政治上也有黨派。在抗戰以前，哲學上的黨派呼聲高唱入雲。抗戰一起了，政治上的黨派呼聲便掩蓋了它，並且還成了一個問題。這是可以從有些人開口閉口都不離開的「各黨各派」、「加緊團結」一類話句中看出來的。因此誰也不能否認今天有一個黨派問題——黨派團結問題存在。

要解決這個問題，我覺得應該把它底歷史的起原考察一下。

在中國歷史底現階段上，國民黨做了很多的工作，並且也做了很久的工作。最初，它把封建政治推翻，建立了民主共和國後，即實行選舉，由各黨各派參加。這種試驗底結果，成績甚壞。加之軍閥割據，需要統一。而騷動主義者、陰謀詭計者又到處搗亂。於是國民黨不得不應着創造統一國家的需要，暫時由它一黨掌握政權。別的一些黨不贊成這個辦法，起來反對。最初，它們各都自命為一大黨，不承認其它。這時是沒有所謂各黨各派的。但國民黨底辦法適合中國創造統一國家的需要，使得別黨底運動歸於失敗。這時，它們沒有辦法，只好互相承認，聯合一致，在日本加緊侵略中國時向國民黨伸手，並且表示誠懇。國民黨代表全國人民，以民族利益為重，遂不咎既往，與以容納。

抗戰文選

在政治上和軍事上，它們都得着相當的地位。但是它們還覺得不够，主張把團結再加緊一點。

從此可知「各黨各派」一句話，含有深刻的鬥爭意義。無論各黨各派在反對國民黨時或聯絡國民黨時都不外向國民黨說：你也是一個黨派，與我們同，所以你應該承認我們，我們有資格與你講平等，政權是國家的，大家都有份，你必須允許我們與你平分政權。而「加緊團結」一句話底鬥爭意義則在於鞏固既得權利和爭取新的權利。它底意思即是向國民黨說：我們底團結還要加緊，所以你不能罷免我們，同時還應該給我們一點，彼此已經團結了，並不是外人呀！

但是，它們——國民黨以外的黨派總感覺得加緊團結有困難。雖然它們把這種困難歸因於外面的挑撥離間，但却非常明白「主要的還是……內部的弱點、各種誤會和摩擦」。它們遂努力於打破弱點、解釋信會、減少摩擦的工作。並且提出「大家相見以誠」、「一切爲公」、「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幫助」、「共同工作、共同負責、共同發展」等等信條。然而它們自己也承認「某些摩擦……難於完全避免」。因此有人覺得方纔團結起來的陣線，已因「無信心」，「離心傾向，互相埋怨與摩擦」而「開始」了「內部的動搖」。但是抗戰又需要停止黨派底紛爭，實現「鐵一般的團結」。那末怎辦呢？怎樣加緊團結呢？

這便是黨派問題提出的經過、意義及癥結之所在。

我不會加入任何黨派，所以我來解決這個問題絕不站在任何黨派底立場。那又是不是個人底立場呢？否。我想以中國底需要和抗戰底需要為立場。而且我想只有站在這種立場上才能對黨派問題——黨派團結問題以正確的解決。

要了解中國底需要，必須了解中國歷史底現階段，不能就任何人底主觀感覺來說。中國歷史底現階段是由封建到資本的時代，因而呈出由割據到統一的趨勢。在這個階段的政治課題是完成統一，即創造近代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民族國家。簡單地說，是在消滅地方割據之中創造一個統一的國家制度。這樣的工作，當然需要一個政黨來領導。按諸各國底近代史，莫不皆然。所以政黨是創造統一國家的條件。

由甚麼政黨來擔任這個工作呢？凡在這個階段中出現的政黨。都可以自告奮勇。於是互相競爭起來。到底誰來擔任呢？結果是認識了統一又有力量來實現統一的政黨為歷史所選擇，其它的政黨被淘汰了。從中國近幾十年底事實和近十年底事實看來，當選的是國民黨。這個階段底歷史使命便落到國民黨身上來了。它底一黨掌握政權，乃是歷史底決定。反之，其它政黨底失敗，也是歷史底決定，怪不得誰。

這樣，國民黨以外的黨派怎能與國民黨平等呢？要講平等，只能從形式上說、法律上說。然而這是空想的、觀念論的見地。在事實上和歷史上，國民黨是負有歷史使命的

黨。因為這樣，它總處於勝利底地位。幾十年來，尤其近十年來，很多的黨派與它競爭，甚至由反對它到打倒它，結果都把它消滅不了，反之倒是那些黨派趨於消滅，或向它妥協投降。這是甚麼意義？這是中國需要它的表示。

因此，國民黨是一切黨派中的驕子，它以外的黨派，根本不能與它講平等。政權雖是國家的，國家却願交給它。在現階段，在變革時代，只有它才有資格掌握政權。它底政權，是一種民主專政——國民的民主專政。難道它還不是在代表全國人民掌握政權嗎？反對它的黨派所堅持的選舉，不過是一種手續、一種形式而已。這在革命的國民黨把它看得較輕。然而也不是不要選舉，只以種種情形不得不延緩。它把選舉看成是憲政時期底事情。

別一方面，創造統一國家的工作，在中國特別艱鉅。因為中國疆域廣大，人口衆多，封建割據尚存在，而且有新的割據出現。此外還有外國對於這些割據勢力的影響和援助。在這種情形下，需要一個大黨——國民黨，並且需要它來代表國民掌握政權。只有這種方式才簡單、便利、運用靈活，足以應付艱鉅的創造統一國家的工作。

所以國民黨一黨掌握政權的事實，不是偶然的，而有其歷史的背景或時代的需要。這是今天任何黨派也應該明白，並且也應該承認的事情。否則便是對於幾十年來尤其十年來的歷史茫無所知。大家還不應該用認識去代替反對嗎？

現在我們來看抗戰底需要。抗戰是戰爭，不獨關係國家底存亡，而且是一個最廣大的和最艱難的工作。沒有強固的中央政權，不能勝任。在統一未完成的中國，尤需要強固中央政權。要它才能發動全國底兵力、財力、人力和物力，領導抗戰，爭取勝利。然而強固的中央政權在近代必須以大的政黨為條件。俄國革命後的事實和意國政變後的事實都證明了這點。那末國民黨便成為抗戰時期底一個需要了。沒有它，強固的中央政權就沒有基礎。

是不是可以用別的黨派來代替它呢？不可以，因為抗戰發生在由割據到統一的階段，它所需要的強固的中央政權要統一才能給與。所以抗戰底需要與中國底需要是一致的，當然只有國民黨相宜。

日本帝國主義明白這點，所以它底侵略在政策上以破壞中國底統一因而以推翻國民黨為主。國民黨中沒有像任何別的黨那樣高唱抗日，然而日本在中國一切黨派中的眼中之釘却是國民黨。河北問題底要求是要國民黨和中央軍退出河北。現在北平的漢奸不是又奉了日本底命令在那裏大聲疾呼地反對國民黨底一黨專政嗎？別的黨呢？日本毫不注意。所謂防共，當然是一種口實，乃對歐美各國掩飾其侵略中國的煙幕，這不從反方面把抗戰需要國民黨一點證明得非常顯然嗎？

中國需要國民黨，抗戰需要國民黨。有了國民黨，創造統一國家的工作和對日抗戰

的工作都可以做得成功。沒有別的黨，這些工作依然做得成功，而且還要便利一些、迅速一些。但若沒有國民黨，那就甚麼都談不到了。這便是國民黨底出現並非偶然的緣故。

明白了這些，還有甚麼黨派問題？假使有了，我們底解決也應該根據歷史底發展從中國底需要和抗戰底需要上大聲疾呼：尊重國民黨底惟一性！擁護國民黨底領導權！它是不二的大黨，惟一負有創造國家、抵抗日本以完成其歷史使命和民族主義的黨！

此外外的黨呢？如果要給中國做點事，為抗戰出點力，那就只有跟着國民黨走。

是的，它們要跟着國民黨走。這是很可嘉許的事情。但正因為要跟着國民黨走，才提出「團結」底口號來。正因為要團結得好，所以才提出「加緊團結」底口號。如果這是沒有別種用心的，那也很可嘉許。

但是團結有兩種方式，一為聯合，一為統一。聯合這種團結方式以承認各個單位為原則。所以各個單位雖是聯合了，依然各是各的。這「各是各的」一點，便是「離心傾向」底根源而這個離心傾向就要發生「難於完全避免」的「某些摩擦」。所以聯合式的團結不能堅固，亦不能持久。而且在某種情形下還要火迸起來。統一這種團結方式則不然。它用以大併小的方法融化小的單位。融化便合而為一，根本沒有離心傾向。所以主張加緊團結的人，應該主張合併。這個合併，根據一九二四到一九二七的歷史教訓，在

實現以後即不能在國民黨內成立黨團，在國民黨外保存組織。

這樣的團結，最爲鞏固，可以嗎？應該嗎？從事實上看來，是可以的和應該的。因爲國民黨外的黨派，主張國家主義的，其國家主義與國民黨底民族主義無別；主張國家社會主義的，其國家社會主義與國民黨底民生主義無別；主張民族革命的，其民族革命亦與國民黨底民族主義無別；兼主張民主政治的，其民主政治與國民黨底民權主義無別。在政綱上亦根本相同。這怎不可合併於國民黨呢？

就是主張社會主義的黨，亦可採取同樣的辦法。它本來與國民黨有別，但在今天，既然一面接受國民黨「根絕赤禍決議」，一面宣言信從三民主義，贊成三大政策，服膺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決議，因此決定與國民黨現在共同救國，將來共同建國，並且要共同工作、共同負責，那不是完全轉變到與國民黨沒有分別的境地去了嗎？既然如此，既然一切都共同，爲甚麼不合併，爲甚麼還要來一個「互相」——「互相尊重、互相信任、互相幫助」，依然成各是各的樣子呢？那是應該合併的。

從此可知今天國民黨外的一切黨派都沒有獨立存在底理由。從它們底言論看來，不止今天，就是將來也沒有獨立存在底理由。假如合併了，即是說統一於國民黨，那對於中國底需要和抗戰底需要便非常相合。在難於統一而又在此過程中遇着強敵發生艱鉅抗戰的現階段，有了這樣的一個惟一的大黨——國民黨，不是很可幸的嗎？

然而到現在，解散黨部聽黨員加入國民黨的很少。大多數依然保持其不必要的獨立性。這是合於中國需要和抗戰需要的嗎？否。一切同於國民黨而還要在國民黨之外單獨存在，這便只有純粹的組織不同了。因純粹的組織不同而單獨存在，難道還是爲了民族利益、抗戰利益嗎？否。那顯然是爲的派系的利益——黨徒們自己底利益。有了團體便可引起人底重視，好向人家談合作，分得一官半職。

這樣的黨派，全然沒有歷史意義，有甚麼價值呢？爲了把國內一切都集中到國民黨領導的抗戰之前來出若干力起見，希望它們發生一個根本的覺悟，拋棄派系利益，爲民族利益而奮鬥。（二月十二）（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掃蕩報）

關於政治機構

葉青

我在三年多以前曾與人談到政治機構底問題。那時我主張刷新。就是說，把它改革一下。及到前年寫「救國哲學」時亦注意到了，把刷新政治機構看成是準備抗戰的方法之一。在去年抗戰發生後，我也提出了刷新政治機構的主張。這是一看我的「抗戰的根本問題」即可明白的。

現在呢？現在隨着要求民主的聲浪，有好些刊物提出了改革政治機構的問題來，這個問題，我覺得比民主政治問題更重得多，有加以注意的必要。

但是那些人對於這個問題的提出和解決，都不能使人滿意，而且非常錯誤。

在提出方面，他們之主張改革政治機構是爲了主張民主。在抗戰中主張民主的誤會，我已批評過了，所以對於這種提出方式，儘可不理。現在要批評的是另一種方式。即他們把軍隊之失去民衆，作爲理由。事實呢？在天鎮陽高那裡。他們於是把隨軍記者的通信給我們抄了一段。這，我想任何讀者都可明白由那些事實形成的軍隊之失去民衆，根本與政治機構無關，顯然是沒有完成統一的結果。假如統一完成了，那種無紀律的軍隊便被整理，不能原樣存在。至於割據勢力的軍隊之失去民衆，與一般的軍事機構無關。

，則更是用不着說的了。

現在我們且來看他們對於政治機構問題的解決。

有的說，要改革政治機構就須召集臨時國民大會。「但在這個危急存亡之秋，事實是不容許我們從容不迫去進行普選的」。那末怎辦呢？於是他們便說「臨時國民大會底代表應由抗日救國的各界各軍各黨派來選舉」。這是改革政治機構的一種辦法。

很顯然的，提出這種辦法的人是連常識都沒有的。但是誰也明白召集臨時國民大會來實現民主那一套，是解決政治制度問題的。政治機構與政治制度不同，它是行政機關。用解決政治制度問題的方法來解決政治機構問題。顯然是連政治機構這一個名詞都沒有懂得的。假使他懂得，改革政治機構便用不着國民大會，政府自己就有權去做了。以現行制度來講，行政院難道不可以改革它自己及其所管轄的種種機關嗎？

假如他們把政治制度和政治機構分得清楚，那末他們主張召集國民大會的辦法便同他們主張實行民主政治一樣，是爲着自己底派系利益了。他們明知道「在這個危急存亡之秋」不能辦選舉，然而又要主張召集 民大會，不顯然是爲他們底由各黨派來選舉這個辦法張目嗎？雖然他們也提到各界各軍，但事實上，各軍忙於作戰，各界不是忙於逃難即是忙於救濟、看護、募集、慰勞、受訓、生產等事，只有各黨派中有些閒人來參加選舉，於是國民大會就由它們包辦，變成其領袖們做官的捷徑了。所以派系利益底結果

是個人利益。當然，除了領袖們外，黨徒們亦可分得杯羹。這便是他們主張以召集國民大會來改革政治機構的用心。

還顯然的，是他們對於改革政治機構的另一種辦法。這辦法可以從如次的話中看出：「比人才問題更爲重要的，就是怎樣把政治機構加以改新。使各黨各派都可以在最高領袖底領導之下分負政治底實際責任」。「改革政治機構，把一切有能力的人統統包括進去」。「吸收堅決參加抗戰的各黨派各團體底有威望有能力的代表參加政府工作，……使政府一切機構」革新，這不把那些黨派領袖們想做官的用心完全透露出來了嗎？

本來，改革政治機構是不一定要把政治機構中的人更換或增加的。反之，倒還要裁人。即使更換，也不一定更換成國民黨以外的黨派領袖，因爲國民黨中和無黨派者中都不少適當的人。他們一定要把改革政治機構解作更換人員、增加人員，並且一定要把民黨以外的黨派領袖弄進去，便顯然是藉口改革政治機構向國民黨要官做了。

主張實行民主政治是要官做，主張改革政治機構也是要官做，他們爲甚麼這樣想做官呢？做官的門徑很多，又爲甚麼要弄一些花樣呢？要解答這兩個問題，必須用社會學的方法。它是一種很好的顯微鏡，可以使我們洞見隱微。

所謂黨派底主要成份是智識份子。智識份子從他由鄉村到城市進中學起就過一種優於鄉村的城市生活。他們畢業之後，因爲資本主義未充分發達，職業範圍很小，容納不

下他們。然而他們過慣了城市的優裕生活，不想回鄉。於是不得不找事做。比較自由，又可有大希望的是幹政治。而在地方割據的情形之下，只要你反對中央政權，隨處都可找得津貼來組黨。不用說，你亦可以利用地方割據反對中央政權的戰爭機會去組織一種軍隊來割據若干地方拉肥勒贖，蝥金到城市上來養黨。並且在這種情形中還可奔走於各地方，以縱橫捭闔底手段煽動戰爭，製造做官機會。在中國歷史由割據到統一的必然趨勢使地方割據失敗時，他們容身無地，便向中央政權投降，分得杯羹。但是還有很多人沒有辦法，當然要繼續地幹。及到統一走上完成之路，中央政權日臻強固，反對既不能，而地方割據亦不多，便只有全部利用機會去投降中央政權了。但總不好提出要官的條件，必須另外找尋口實。於是實行民主政治，改革政治機構底口號，便叫出來了。

這是改革政治機構在他們爲由各黨派領袖組成國民大會和由各黨派領袖加入政府機關的原因。雖然他們還主張把各方面有能力的人都包括進去，但這只是一種掩飾。而在實際上則很荒謬。各方面有能力的人很多，抗戰時期也正需要他們在各方面努力，若把他們統統加入政府去做官，一則勢有所不能，政府人員根本不應該多，抗戰尤以少爲便，同時經費亦不允許；再則各方面底事情不可停頓，正需要他們。所以這種主張是荒謬的。

本來主張改革政治機構的人中已經有些加入政府底某種機關了；但他們嫌加入名額

很少，所以聽着名額有擴充可能，遂認為政府在「向着『改革政治機構』這方面努力」。不過他們又覺得那只是諮詢機關，不如行政機關之足以位置黨徒，遂再來一套改革政治機構論。這樣，改革政治機構在他們便只有加入國民黨以外的黨派領袖到政府種種機關去的一個意思了。

真的，改革政治機構就是這個意思嗎？否，絲毫不是。改革政治機構從舊有的政治機構看來，應該在簡單化、敏捷化、廉潔化上努力。抗戰所需要的政治機構，也就是合於簡單化、敏捷化，廉潔化三個原則的政治機構。

爲甚麼要簡單化？因爲我們底政治機構中有很多性質相同的機關，架床疊屋，徒增手續上的麻煩、權限上的混亂，反而把事辦不走；並且在經費上，又徒增加支出，空耗帑。這在抗戰時期，尤不相宜。抗戰時期，情勢緊急，以迅速爲好。國帑則收入少而軍事的需要又多，自不能不節省政費。至於冗員底裁汰，是更不用說的。那末改革政治機構在這裏就以裁併機關、減少人員和裁汰冗員爲要務了。這怎能把改革政治機構看成是增加人員的運動呢？

爲甚麼要敏捷化？因爲我們底政治機構中有一種官僚習慣存在。這種官僚習慣，具體說來，就是在辦事上有因循、敷衍、延宕、等等毛病，以致行政效率非常之小。很多事情因此既辦不走，又辦不好。在抗戰時期，尤須提高行政效率方能適於緊急的情勢。

所以改革政治機構在這裡以掃除官僚習慣、增加行政效率為要義。這是不是需要更換人員呢？不一定。只要在制度上講究，再加以負責官長底提倡和監督，便成功了。即使有更換人員的必要，那亦不過是撤一警百的意思，目的不在更換。所以添進去的人非常有限，安置不了全國各方面一切有能力的人。這又怎能把改革政治機構看成是增加人員的運動呢？

為甚麼要廉潔化？因為我們底政治機構中有許多貪污底劣跡。中飽稅收、侵吞公款、接受賄賂等事，常常有之。因此，國家底收入受影響，支出則用了錢不會做事。假如買東西，便是用了錢不會買有或不曾買着好的，……。結果，人民負擔很重，並且遭受種種非法的剝削，無以為生。這種情形，在抗戰時期有了，遺害國家很大。它使政府蒙受財政上的困難；並使人民怨恨政府使抗戰得不着人民底援助。所以改革政治機構非常必要。同時，改革政治機構在這裡以消滅貪污行為樹立廉潔習慣為主。這是不是需要更換人員呢？同樣不一定。它底開始在於嚴申貪污禁令，實行審核制度和監察制度，要發覺了貪污的事，才能更換人員。其實祇要禁令森嚴，制度完善，貪污的亦不敢貪污，大家都廉潔起來了。這又怎能把改革政府機構看成是增加人員的運動呢？

明白這些，便可知道改革政治機構是甚麼意思了。這樣的改革政治機構，在政府已經注意到，並且已經實行了好久。不過因為改革困難，未能一一實現。在抗戰時期，政

府又有所注意。前月四日，蔣委員長兼院長會通令全國嚴禁貪污不法。本月二日，政府公布行政院改組，裁併了很多機關。這當然還沒有完，要繼續改革。不過改革政治機構不以增加人員進政府去為內容則很明顯。即使有所更換，加入的亦沒有必以國民黨外的黨派中人為條件的意思。政治機構問題不是民主政治問題呀！

然而他們竟不了解這些，因而竟不了解改革政治機構底意義。這是真的嗎？假如這是真的，那就證明他們缺乏常識，應該多讀書，少說話。假如這不是真的，那就證明他們底主張不是客觀的真理，乃是為了主觀需要故意那樣說了。這種為自己底派系利益，為派系底做官來主張改革政治機構，根本是一種「卑鄙的」行為，毫無價值。而且因為要利用改革政治機構底要求來做官，遂強不知以為知，至於歪曲改革政治機構底意義，同樣是「卑鄙的」行為，毫無價值。

凡是真正要求改革政治機構，目的不在自己加入政府中去做官，而在為了抗戰的人，應該起來反對這種藉口改革政治機構來謀一派一系之私利的「卑鄙的」行為。凡是真種了解改革政治機構的意義，而又願純粹為科學為真理奮鬥的人，同樣應該起來反對這正為着一派一系之私利遂強不知以為知的「卑鄙的」行為。祇有把謬論肅清了，真理闡明了，政治機構底改革要求才能展開，獲得完全的成功。（二十七年一月十六日掃蕩報）

國家戰時軍治化

現今我們國家的政制，在法律上是國民黨的黨治，在一般的政治情緒上，則要求黨治的民主化。這種制度與情緒並不絕對衝突，是可以共進而合流的。在對日抗戰的國家現況下，黨治已嫌不夠，民主亦還迂遠，主要的是加強國家戰事的軍治化，現在我們國家的政策是抗戰第一，國家的利益是軍事高於一切。在目前以至於三五年內階段上，是我們從事民族解放戰爭的時期，一切一切，皆要以軍事利益為第一目標，凡有利於軍事的都要併力進行，凡較緩於軍事利益的皆可緩漸進行。由國務到庶政，都要以軍事部勸，一切要建設在軍事利益之上而軍治化。

近代的國家，一遇國際戰爭，平常的政府機構馬上改造，成爲一個有力的戰時政府，一切法律政令皆集中於最高總司令部的指揮之下。我們對外抗戰業已半年，只看見政府機關的顛沛流離，不見有一個強力的戰時政府出現，甚至在制度上還在爭論着黨治或民主的問題。這現象，縱使不是我們的政治能力薄弱，也有若干精神是浪費了。

國民黨的黨治已實行了十幾年在平時的政治缺陷可置而不談，在這半年來的抗戰中所暴露出來的種種弱點，還不够說明這個黨治的不健全嗎？國民黨以外的各黨各派的要

求民主，這在抗戰以前是應該的，到現在還可以從事實技術上去求逐漸實現，但若用這一個口號發動政爭，因而發生政治上的摩擦，那便很嚴重的違反國家利益了。我們是主張民主的，但在今日，為抗戰的利益計，則須加強國家戰時的軍治化，全國凝結成爲一個團體，在我們取得抗戰的最後勝利後，國家政治自然民主化了。

目前的事實，便是說明這種趨勢。西安事變以後，國民黨的門戶業已加寬；抗戰發動以來，黨治的形態正在刻刻蛻變之中。這蛻變的趨向，很明顯的是在逐漸的民主化，這蛻變必將隨抗戰的進展而加劇前進。各黨各派在這時要共同支持國家的政治中心，團結抗戰，不必呼號民主，國家的政治的動態自然趨於民主化。這在理論與事實上，均是如此。在這時談黨治，與談民主，在談者雖各有其立場及理由，其實談之無益，不談則反可順政治的蛻變而合流。大勢如此，何須爭論？最要緊的是大家共同著眼於抗戰的利益，加硬國家戰時的軍治化。充實大本營的組織，舉凡政治軍事，一切歸其統率，一切聽其指揮，而一切統治指揮皆以軍事的利益爲依歸。在民治成熟的國家，到戰時國會且停止活動，一切授權於戰時政府，我們在這時還不應該使國家軍治化嗎？

在對日抗戰的國家的現況下，黨治已嫌不夠，民主亦還迂遠，主要的是加強國家戰時的軍治化。國家在戰時，軍事利益高於一切，我們國家的政治需要軍治化。（大公報）

主權政權與黨權

自從敵人「一·一六」聲明書，公然宣布今後不以國民政府爲對手，中國國民和世界人士，對於日本野心，都是更進一步的認識：就是日本軍閥的態度更橫暴，手段更毒辣，其目的非將獨立的中華民國置於日本統治下殖民地化不可，非使四萬萬五千萬中國男女成爲日本的奴婢，聽其役使不可。因爲事實很明顯，代表中國獨立人格和衛護國家領土主權的國民政府，既然被敵人否認，其意義也就是否認中國這個國家的存在。無論敵人怎樣花言巧語的說期待中國真正願與日本提議的所謂「新政權」的成立及發展，可是，任何人都知道所謂「新政權」完全是日本製造的漢奸組織，完全是敵人「以華制華」毒計的實施，絕對沒有半點獨立性，更不配說是代表中國國家和人民。所以，凡是稍有國家觀念的人，看到那個聲明以後，除了覺得敵人無耻和狂妄以外，那個聲明並不能發生什麼作用，不但不能將國民政府打倒，而且更可使國民政府獲得全體國民熱烈的擁護；因爲敵人的聲明已教全中國人認識了主權和政權有着不可分性，要想保衛國家主權，必須一致努力鞏固國民政府的政權，不然，整個中國就會亡於日本，子子孫孫就會和朝鮮台灣의 同胞一樣過極黑暗極痛苦的非人生活！老實說，敵人的一紙聲明，確確實實

，比我們十年教育還要有力量，有效果。

目下敵人在軍事上正加緊進攻，佔領蚌埠後，還想以全力取得徐州，企圖打通津浦綫，樹立大規模的漢奸政權。這種姿態，我們早就看到，敵人發出「一·一六」聲明後，可說是更見鮮明。牠爲了使「一·一六」聲明中所說的各點具體化，今後的進攻，必將更兇猛；我們爲了粉碎敵人的幻想，打擊敵人的侵略，今後的抵抗，必須更堅強。自然，領導着全中國國民發揮這種抵抗力量的國民政府，也更應該促其強化，使其鞏固。在今日的環境和需要下，中央政權已和國家主權，凝結爲一，這個事實，大家既然看得非常清楚，當然需要切實擁護。我們萬不能長讓大好河山飽受敵人蹂躪，長看男女同胞慘遭敵人淫戮！鞏固抵抗侵略的中央政權，纔有消滅賣身投靠的漢奸組織，擁護爭取獨立的國民政府，纔能打倒貪慾無窮的日本軍閥！這是給予敵人進攻的最實際的答復，最有力的警告。

全中國人都要知道，只要我們以全力擁護國民政府，國民政府絕不是任何暴力所能打倒，只要國民政府永遠存在，中華民國也不是任何暴力所能打倒。全中國人還要知道，國民政府不是由一個普通政權形成，它是由創造中華民國的國民黨所領導，有主義，有組織，有領袖，而且有歷史，有成績，換句話說，就是政權建築於黨權的基礎上，大家只要看看這幾十年來，國民黨先對專制君主後對北洋軍閥奮勇鬥爭的堅苦歷程，就可

判斷在它領導下的政權，絕對會有光明的前途！無論敵人怎樣在軍事上加緊進攻，在政治上陰謀分化，我們不必悲視，不必畏懼。由各國政治上看，凡是主權政權和黨權成爲三位一體的國家，其力量只有日見增強及加厚，如蘇聯，德意志，土耳其，都是好榜樣。

基於以上的認識，我們在這裡要向全國國民，貢獻幾點簡單明瞭的意見：

第一，今日保衛主權既須鞏固政權，而政權是由國民黨所領導，那麼，我們從根本上着眼，就應該以全力擁護國民黨的黨權。

第二，擁護黨權就是擁護黨治，而黨治的最進步形態是由一黨獨裁，如蘇聯只有共產黨，德國只有國社黨，土耳其只有國民黨，黨外斷不容許有他黨的存在及活動。我們既知道必須擁護國民黨的黨權，纔能鞏固敵人所仇視的政權，保衛敵人想侵害主權，那麼，只有由國民黨一黨獨裁。

第三，國民黨的一黨獨裁，不是爲了一黨的利益，而是爲了民族的生存；這種獨裁，也就是代表全國國民執行爭取獨立自由解放的任務，只要是不甘做奴隸的人，都應該無異議的服從，無條件的擁護。

第四，在一黨獨裁的至高原則下，如果有違反這個原則的組織及活動，其結果必會分散抗戰力量，妨害中央政權，影響國家的前途，從良心上懺悔已往的錯誤，在工作上

表現個人的真誠，爲了民族利益，投向三民主義的懷抱裡向前奮鬥！假若在這樣緊急嚴重的關頭，還不悲悔，還要作種種誘惑青年煽動青年的宣傳和活動，還要保持舊的獨立系統，創造新的割據形勢，便無異是自棄於國人，自絕於民族，全國國民都應該起來予以糾正，制裁，和消滅！如果姑息放任，說不定民族的一線生機，就會被其斬斷。

以上所說的話完全以保衛國家主權尋求民族生路爲出發點，到這時候還需要說這種話，我們真正感覺着異常悲痛！中國人如果再不覺悟，再不爭氣，將來如想再求這個磨練建國力量的好機會，絕對不可得到！大家都要認清民族危機，明瞭政治環境，在國民黨的領導下加緊努力，堅苦奮鬥，纔對得住上代祖先，和下代子孫！纔能算是中華民國的好國民！我們相信一定有不少的人和我們有同樣的認識，同樣的感覺，這裏寫出的與其說是呼籲，不如說是共鳴。我們希望由這個共鳴裏能夠奏出中華民國獨立解放的偉大樂曲，更希望全國國民都負起這個樂曲的製譜責任！（武漢日報）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解散宣言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係李濟琛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陳友仁徐謙等倡導組織，以抗日救國爲號召。自蘆溝橋及上海事變發生後，在蔣委員長領導之下，中央政府已發動偉大之全面抗戰，該同盟認爲當前全國民衆，均應各盡其力，擁護政府，在最高領袖領導之下抗戰，方能達到最後勝利，故於十月三十日發表宣言，正式解散該同盟之組織。茲錄其宣言於次：

「我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之成立，其目的端在促進全民族力量之集中，對日抗戰，以達到中國之獨立自由平等，自蘆溝橋事變發生後，全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下，毅然作神聖之自衛戰爭，我民族已呈現空前未有之統一，在此偉大民族戰爭逐步展開之時，吾人應本公誠之態度，共求民族統一之堅固，促進全民抗戰之成功，故於八月發表宣言，號召國內外盟員及全國同胞，全體動員，各盡其力，擁護政府，抗戰到底。復於十月二十五日，經最高會議議決，正式解散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之組織。吾人深信此種光明表示，足以增強全民族團結之信念，我海內外同盟組織一律結束後，所有力量，自當貢獻政府，效力抗戰，以貫徹吾人之素志。所望全體盟員，此後各自淬厲，本歷年抗戰之決心，作

民族忠貞之戰士，並望我政府在此存亡一髮之秋，積極動員全國民衆，共赴此神聖之民族戰爭，以爭取最後勝利，完成民族解放之使命，實現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謹此宣言。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宣告解散感言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之負責人李濟琛陳銘樞蔡廷鍇蔣光鼐陳友仁徐謙等，日前宣言自動解散該同盟之組織。其宣言略稱：「自蘆溝橋及上海事變發生後，全國在蔣委員長領導下，毅然作神聖之自衛戰爭。」「故於八月發表宣言，號召國內外盟員及全國同胞，全體動員，各盡其力，擁護政府抗戰到底，復於十月二十五日，經最高會議議決，正式解散中華民族革命同盟之組織。吾人深信此種光明表示，足以增強全民族團結之信念，我海內外同盟組織，一律結束後，所有力量自當貢獻政府，效力抗戰。」我們讀此宣言，非常欽佩，現在貢獻幾句話。

這個自衛戰爭，太艱難太重大了，至少，今後中國一百年的歷史，要決於此一戰。勝了就是自由民，敗了就做日本奴隸。而我們國家，本來無國防，有一點，只是近年掙扎勉強準備的。今天既被迫上了最後拚命之路了，我們憑甚麼，當然先憑人。暴敵這一把無情之火，應當是把我們內部一切矛盾都鎔毀了，只留下一個共同意志。一切有智識不甘作奴隸的人們，都只許有一個共同意志。就是自衛到底，抗戰到底，這本是三個月以來全國業已充分發現的。但是還有一更要之點，就是，中國今天是軍事高於一切，而

軍事的本質，是要統一，要集中，所以全國人材物力，必須集中於最高戰時體制之下。全國要成惟一的組織體，以共同擁護政府，貫徹抗戰。

中華民族革命同盟的解散，可謂適於此種需要。這證明該同盟之至誠愛國，毫無私念，當然對於內政外交，皆有極好的影響。我們因此希望一切在過去自有政治組織的愛國人士，精神上都要這樣。關於貫徹自衛戰爭的政略戰略上許多問題，大家要扶助并信任政府，要完全服從最高統帥部指導。特別關於國際問題，政府領袖正殫精竭慮，為最善之努力，大家要以統帥部之認識為認識，不使敵人奸計，絲毫得逞。我們同時則請求政府要如李濟琛諸氏宣言所云：「積極動員全國民衆，共赴此神聖之民族戰爭，以爭取最後勝利，完成民族解放之使命，實現民有民治民享之國家。」我們呼籲取消意志歧異的小組織，但同時必須主張積極的實現意志共同的大組織。中國建國原則，是確定了的。只求政府本三民主義的精神，更集思廣益制為政治的經濟的各項實施綱領。全國一切人，要信守綱領，共同奮鬥。政府要負責使全國有熱烈民族意識有衛國決心的政治上文化上一切人，都能實際做擁護政府抗戰的工作。歸根一句話：要團結，要互助，要澈上澈下，無黨無派，都至誠相見，以共同擁護領袖，貫徹這艱難困苦的自衛戰爭！（大公報）

中國青年黨代表左舜生上書 蔣汪兩總裁

(附總裁覆函)

中國青年黨代表左舜生，最近具函蔣汪兩總裁，申述彼等夙昔主張，與總理遺教精神相符合，願一致共赴患難，始終擁護政府，為抗戰建國盡最善努力，蔣總裁汪副總裁當即覆函，以共同奮勉，攘除外侮，實現三民主義相勗望，茲併錄來書及覆函如下：

左舜生函：介石精衛先生惠鑒，敬啟者，國難尚在極嚴重之階段中，中國青年黨同人雖堅信長期抗戰最後勝利，必屬於我，但在目前，則尚不敢即以輕忽之心，遽弛其戒慎之念，國民黨最近所發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及抗戰建國綱領，同人等曾詳細閱讀，並以極端之善意迎之，深信果能斟酌緩急先後，逐一見諸實行，必與國家有益，中山先生畢生奮鬥之目的，其一在爭取中華民國之自由平等，此次國民黨領導全國抗戰，即此遺教精神之具體發揮，其一在建國必以憲政為指歸，此次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在此非常時期，不忘國民參政機關之建立，國民言論出版集會結社自由之保障，亦即異日憲政實施之端緒，與同人等夙昔主張之國家主義民主政治，適相符合，願表示甚深之敬佩，國民政府為今日舉國共認之政府，亦即抗戰唯一之中心力量，同人等必本愛國赤

誠，始終擁護，中山先生謂三民主義爲救國主義，如公等認同人等夙所主張無背于救國之原則，俾同人等十五年來所慘淡經營之一集團，在抗戰建國過程中，得盡其最善之努力，庶於國家前途，能有較大之貢獻，同人等唯認定國家至上，故在過去十五年中，雖對政治不負任何直接責任，而愛護國家終始不渝，補偏救弊，未嘗因環境艱難而稍懈其努力，至其成績如何，固不欲自爲陳述，總之同人等視目前之艱患，念來日之大難，僅有與國民黨共患難之一念，此外都非所計及，僅知國家不能不團結以求共保，此外亦無所企圖，坦率直陳，力求實踐，耿耿之懷，敬候明教，此頌勛安，中國青年黨代表左舜生謹啟四月二十一日。

蔣汪函覆：舜生先生惠鑒，展誦來書，承示對於國家前途之觀察，思深慮遠，至切欽佩，並承示及夙昔主張，與本黨總理孫先生畢生奮鬥之目的相符，掬示擁護政府之赤誠，願爲抗戰建國而盡最善之努力，誠摯坦直，矢共艱難，循誦之餘，彌深感慰，本黨對於抗戰建國大計與期望，已具詳於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與抗戰建國綱領，責任所在，無可旁貸，而實踐之功，必資羣力，今日舉國共同之期望，唯在攘除外侮：實現三民主義以救國，本黨念職責之艱鉅，尤望集中全國賢智之心思才力，以共濟此日之艱危，而謀國家久遠之福利，苟斷向之從同，必團結而無間，此願共同勉者也，輒因來書布其誠款，即維鑒察，祇候台綏，蔣中正汪兆銘謹啟，四月二十四日。

與力量，不分黨派，我們相信這樣制度不是不能創造的」。但歐戰之後，批評民主政治者，往往而見如今之義德等國，竟目民主政治為惡劣政治，同人等以為政治的社會之要素，不外乎二。其屬於國家者為權力，其屬於個人者為自由，為行政之敏捷，與夫應急之處置計，不能不抬高權力，為個人之自發自動與養成自己負責心計，不能不許以言論結社之自由，地方自治與夫參政大權，惟有此等權利，而後人民有實際上參預政治之機會，而後知輿論界議場上政府中言論之不可以苟發而高調與笑罵之無濟於事。蓋民主政治之下，人民得真正參加政策之決定，其責任心自養成，其政治智識自增進，及至國難臨頭，尤貴乎事權之統一與執行之敏捷，彼此同心一德，以最高權力託之於戰時政府，可見正惟平日民主政治之實行及至戰時人民自然感覺權力集中之必要，如歐戰時之各民主國之戰時內閣，皆其彰明較著者也。第三，社會主義，關於經濟制度，同人期望社會主義之實現，政綱中曾有語云：「一為個人謀生存之安全，並改進其智能與境況計，確認私有財產。二為社會謀公共幸福，並發展民族經濟與調劑私人經濟計，確立公有財產。三不論私有與公有，全國經濟，須在國家制定之計劃下，由國家與私人分別担任而澈貫之，四因國家計劃，使私有財產趨於平衡與普遍，俾得人人有產而無貧富懸殊之象。五國家為造產之效率增加及國防作用計，得以公道原則平和方法移轉吸收私人生產或其價值，以為民族經濟擴充之資本。」自此三點觀之，可知同人等之主張與中山先生民族民權

民生之三大義措詞容有不同，而精神並無二致，良以中山先生之三大要義，固已確定吾國之立國之大經，而莫能出其範圍，「然立說內容間有出入，則以政象因時而異，藥石自難盡同，此環境使之然也」。況衡諸抗戰建國綱領二十六條，在抗戰期不違反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及法令範圍內，對於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當予以合法之充分保障云云，則政府態度與在野黨派所要求不謀而合，在同人等自當開心見誠，以國家社會黨之主張行動，向公等公開而說明之。顧政治不獨限於若干項之大綱，倘有因時因地因事而生之問題，非今日所能預測。同人等更願本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意旨，與國民黨領導政局之事實，遇事商承，以期抗戰期中言行之一致，此同人等願為公等確實聲明也。更有進者，方今民族存亡，間不容髮，除萬衆一心對於國民政府一致擁護而外，別無起死回生之途，吾輩同志之中，有參加民元之革命者，與反對洪憲之帝制者，平日自命為對於中山先生創建民國之工作，亦嘗負弩前驅因此愛護民國之心尤為深切，則處今日強寇方張僭竊潛起之際，尤當追隨公等之後，鞏固主權，保全國土，使中華民國長保昔日之光榮，且得今後之自由發展，此亦同人等區區志趣所存，當蒙鑒察者也。特佈肺腑，惟祈亮照，專此敬頌助安。

國家社會黨代表張君勛拜啓，四月十三日。

蔣汪函復：君勛先生惠鑒：頃誦來書，承示所有主張，與三民主義最高原則在精神

上並無二致，今後更願本精誠團結共赴國難之旨，遇事商承，以期抗戰期中言行之一致，而於擁護政府維繫民國尤拳拳致意，語重心長，至爲敬佩，而態度之坦白，情意之懇摯，尤見謀國之忠，憂時之切，實深欣慰。中國國民黨對於抗戰建國之大計與期望，具於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中，本黨同人念國難之方殷，責任之未盡，在國民大會未召集以前，自當竭其心力，勉其責任，更望全國賢智之士，或加入本黨，共同負荷，或維持其信，一致努力，俾捍禦外侮，復興民族之使命，得以早日完成。凡此熱忱，定荷垂察。至言論出版結社集會之自由，抗戰建國綱領第二十六條既已確定其範圍，並加以保障，自今以後，惟當本此方針，共相策勉，庶幾同心同德，弘濟艱難，國家民族，前途光明，有繫於此。掬誠奉復，諸祈鑒察，專此敬候台安，蔣中正，汪兆銘啟，四月十五日。

中共中委張國燾申明

閱讀本月二十二日新華日報，登載中共中央關於開除張國燾黨籍之決定一節，本人特為如下之簡單聲明：

(一)本人素具抗戰到底之堅強決心，和抗戰必勝之堅強信心，對於中國抗戰建國之光明前途，並無絲毫失望。本人更願貢獻一切，為國家民族效力。

(二)當此國家民族危急存亡關頭，本人認定國家民族高於一切。

(三)三民主義為中國今日之必需，中國國民黨為主持抗戰建國大計之領導中心，蔣先生為全國唯一之最高領袖，此三點，中共中央亦不否認。中共中央主張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方針，自是中共中央的進步，本人亦表贊成，但深覺如此還是不夠，因主張中共中央對於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抗戰建國綱領，應即為更懇切之響應，以達更進一步之精誠團結，和增強抗戰建國力量之目的！

(四)本人曾本上列主張，用至誠態度，與陳紹禹周恩來秦邦憲三同志初步商討，不意此項商討，僅在開始進行，中共中央突有開除本人黨籍之決定，公佈報端。本人與中共關係極深，該決定內所說，均不必急於答辯，甚望中共中央和中共同志對於本人

上列主張深切考慮，並與本人繼續誠懇商討，不使稍有遺憾，俾吾人與國人士均得共本抗戰救國抗戰建國之主旨向前邁進則幸甚矣。

張國燾啟

編者按：中共中委張國燾先生，因為認定了國家民族高於一切，對中共現有的比較進步的態度，仍然不能滿足，他主張更進一步要中共有澈底的精誠團結的表示，其真義在根本解散中共組織以積極增強抗戰建國的力量，在今天這是任何一個真正愛國而勇敢的中共黨員應有的表示，尤其是張先生！——一個中共有力量有歷史的基幹人物！我們讀了這篇啓事，爲了抗戰前途和國家民族永久的生存與光榮，真是禁不住的欽佩歎欣！張先生和張君勸左舜生等一樣的帶給我們無限的光明了！

國際反侵略會代表色斯痛斥日帝國主義

日本侵略中國有如子女打母親

集合國際間人民力量反抗侵略

切盼我全國團結統一領導和平

國際反侵略中國分會、國民外交協會、中國國聯同志會等十四團體昨日下午三時假普海春招待國際反侵略總會來華代表法名記者色斯 (Pierre scize)，到邵部長、黃副部長、陳銘樞暨各團體代表等三百餘人，開會後，首由邵部長致歡迎詞後，即由色斯致詞，大意謂：「余此次來華，首先感謝蔣委員長，在軍務冗繁中，仍予以熱烈招待，並得貴國各長官民衆之協助，得達目的地，並獲得余欲知曉之一切材料。余此次來華任務，將以在華之見聞，忠實傳播到全世界，並將所得材料刊諸巴黎晚報，因該報擁有大量讀者故也。」

此次來華，見到中國有極大的進步，物質方面姑且不論，僅就精神方面而言，由於孔子與中山先生精神之影響，得使中國今日有如此無限之抵抗力，尤其在日寇侵華後，國內情勢劇變，自西藏最高山嶺以至極東之海岸，北方沙漠地以至極南疆界，全中國人

民均集中於一個政府之領導下，統一部調，向一個目標共同奮鬥。如此之統一，在中國實係第一次，而全世界人士猶尙未能知曉中國已能有如此堅強之團結，此點在余返國後，將特別廣爲宣傳。

本人曾參加歐戰，惟最近二十年來，努力反戰運動，無時或間，過去余曾幻想和平行動或能消除暴力，但至終更余非常失望。貴國此次在無限悲慘與痛苦情況下之奮起抗戰，給予全世界一至高之貢獻，使全世界人士得知和平並非虛渺，乃有實質者。我等欲保護並維持和平，我等必需以我等之血、肉、和一定之代價，始能保護之，維持之。而貴國此次英勇之抗戰，使全世界人士對此點得能清楚認識，我等應深表感謝。但僅感謝尙嫌不足，我等應設法報答貴國如此壯烈之犧牲精神。

固然設國際聯盟果能照正制裁並打擊侵略者，則余等亦不必多此一舉，現國際聯盟既事與願違，我等故乃企圖以國際間人民之聯盟以替代國際間政府之聯盟。是以有國際反侵略總會之成立焉。對於侵略者，最寶貴之制裁方法爲經濟制裁。

此次由於各國之抵制，日貨之出口已減少百分之十矣。余希望在座各位注意，全世界文化人今日均係愛護中國，擁護中國者。對中國此次抗戰，均表深厚之同情者。日本向國際間宣佈，日本此次爲欲使中國由野蠻變成文明而作戰，然余等均知此係荒謬絕倫。世界人士均知日本文化係來自貴國，貴國已有數千年之文明，貴國堪稱日本文化之導

師，日本若干文人均係中國之學生，而現今日本竟顛倒其詞，此誠如一不孝兒孫，忤逆其親長。

剛才所舉許多事實，世界人士均已深切知曉，當余返歐後，定將余所見所聞作詳盡報告，貴國所受之痛苦和虐害，貴國人士之如何酷愛和平以及貴國之具有無限大之抵抗力，當一一廣為傳播。余相信世界人士將來對貴國定有具體之表示。余且深信貴國定能獲得最後勝利，但希望貴國人士在將來抗戰勝利之後，精誠團結情形，仍能如現在抗戰一樣。且貴國今日為反侵略而戰，余希望在抗戰勝利後，切勿驕傲，蓋否則勢將步入歧途。

今日余在此不僅慶祝貴國抗戰之勝利，並希望貴國在將來仍能領導世界人士走上和平之路云。（四月十八日大公報）

第四類 軍事上的經驗和教訓

如何使用民力

汪精衛

抗戰期間，對於民力之使用，必須採取極經濟的辦法，應當使用的時候，盡可能的使用，不可有一毫姑息，同時盡可能的愛惜，不可有一毫浪擲，這于長期抗戰，關係尤為重大，因為長期抗戰，最需要的是民力不斷的生長，如果不知愛惜，則只有消耗，而無培養，憑什麼來生長，憑什麼來支持長期抗戰。

如果這觀念不錯，則我們對於數月來流行的一兩個口號，不可不給以正確之標準和內容。

本來對於一名詞，必須給以一定義，如果這一名詞，被採用做口號，則更不能不將其定義解釋明白，不然將有無數壞事，在一個好口號之下，掩蔽住了，蔓延起來，其流弊有不忍言的。

舉個例來說，焦土戰這名詞，其意義應該是人人以必死之決心，盡可能的努力，敵人來犯，把人力物力悉數使用，以與之抗，雖至人人皆成齏粉，物物皆化煨燼，亦所不

辭，這意義是極嚴肅的，同時是極正確的，自從抗戰開始以來，其在前方，一般將士，以其生命與敵相搏，前仆後繼，亘于數月，一般民衆，或則肝腦塗地，或則顛沛流離，其在後方，空襲一來，不問爲政府機關，文化機關，社會團體所在，以及人民住宅，皆一樣的爲玉碎，不爲瓦全，人人對此，皆視爲責有當盡，義無可逃，始終沒有一句怨言，就爲的是，自抗戰以前，早已下了決心，爲國家民族的生存而準備一切，及至抗戰開始，則又下了決心，將此一切準備用于爲國家民族爭取生存，正如古人所謂「竭其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其濟，國之福也，不濟，則以死繼之」，因爲有了這樣的決心，所以即使戰至罄其所有成爲一片焦土，而勇氣絕不爲之少挫，這樣的焦土戰，其所發生的效力與影響，有以下的幾點，第一，我們固然焦頭爛額，敵人也不免有相當損失，會給別人尋著破綻，使出卞莊子的手段來，至少可使我們遂其及女偕亡之願，第二，敵人每到一處，其始是取之不易，其後是得之無益，足以沮喪其侵略的野心，第三，人人有了必死的決心，則軍隊的紀律因鍛鍊而越整肅，人民的秩序因鍛鍊而越緊密，這種鍛鍊有使散沙成爲鐵石的可能，第四，先以堅決的抵抗，繼之以壯烈的犧牲，這種精神深入于後死一般人心中，自然激發其忠義之氣，絕不會于無形之中播下了傀儡的種子，以上幾點，都是由焦土戰所必然發生的効力與影響。

但是我們必須認清楚所謂焦土戰者，是因戰而至于焦土，絕不是一戰，更絕不是即

使不戰也要焦土，由前之說，是焦土戰，由後之說是不戰而焦土。二說絕不相同，不可混爲一談，焦土戰必然能發生以上所述的効力與影響，不戰而焦土，則不惟不能發生同樣的効力與影響，而且適得其反，因爲既然打算不戰，則其決心先鬆懈了，其紀律也就隨以廢弛了，其秩序也就隨以紊亂了，於此而猶言焦土，其結果只有老百姓晦氣，而敵人則正如隔岸觀火，真所謂爲親厚者所痛，仇讎所快，萬萬要不得的。

有人說道，「這話不然，拿破崙之坐困於莫斯科，不是上了俄國不戰而焦土的當麼」，我以爲這話似而非，拿破崙時代交通尙未發達，以百萬之衆懸軍深入，又值嚴寒之際，冰天雪地，運轉困難，及至到了莫斯科之後，地窖中雖有餘糧，而沒有得煤炭，人馬凍死，不計其數，俄國乘之，分兵四擊，這是其坐困之原因，如今的交通工具之發達，非昔日可比了，水有汽船，陸有火車，有汽車，空有飛機，敵有一面固要速戰速決，一面也要穩紮穩打，欲使敵人被困，豈能容易上當，只有處處抵抗，人人抵抗，使敵人不踏着我們的血跡，一步不能前進，而且前進之際，是不能不後顧者，留得兵多，消耗必大，留得兵不多，我們可以斷其交通，切其聯絡線，這樣做法，或可以使敵人坐困，然而這是由戰而得來的，絕不是由不戰而得來的，如果不戰，即使焦土，我敢決其不能，坐困敵人，我們必須牢牢記着，每焦一塊土，其中不知含着多少脂膏，多少淚，多少汗，多少血，如果我們不得已而至於焦了這一塊土，則我們絕不能只毀了自己，至少至

少也要給敵人以灼傷，不然我們如何對得住老百姓，如何對得住良心呢。

再舉個例來說游擊戰這名詞，其意義應該以精銳的軍隊，與有生產能力的人民深相結合，對於敵人避實擊虛，避堅擊瑕，使敵人顧此失彼，窮於應付，這於戰事，是極有意義的，尤其於長期抗戰，是適用的，然就此意義，便可知游擊戰，也須具以下兩條件：

其一是精銳的軍隊，因為担任游擊戰的軍隊，其戰鬥力不可不堅強，其紀律不可不嚴明，這樣才能行動神速，隨時隨地，給敵人以打擊，其二是具有生產能力的民衆，所謂生產，包含精神生產，物質生產在內，有生產能力的民衆，是良好的民衆，只有良好的民衆，才能與良好的軍隊結合，我們必須知道在展開游擊戰的地方，軍隊如魚，人民如水，魚沒有水是不能遊的，欲使軍隊能活潑自如，必須使民衆健全有力。

明白以上兩條件，則可知道在積極方面，對於能戰的軍隊，應當加以重視，充其所需，俾得盡其所能，對於有生產能力的民衆，應當解除其痛苦，發展其能力，尤其應該加以組織，加以訓練，這樣才不致如孔子所云，以不教民戰，而為國家民族，盡其更大之責任，在消極方面，則土匪不可收編，因為以土匪担任游擊戰，必致遊而不擊，對於敵人，只知避實，不知擊虛，只知避堅，不知擊瑕，其結果且將更進一步所避的是敵人，所攻擊的是民衆了。至於流氓無賴，如果不洗手做人，是不能使他混入民衆組織裏頭

第二輯
的，焦土戰遊擊戰，這兩個名詞，本來是戰術上的名詞，然而流行起來，漸漸的成爲政治上的名詞了，對於民力所關甚大，善用之可以使民力發展，有益於長期抗戰，不善用之，則可以消耗民力，斷絕了長期抗戰的生命，盼望沿用這兩個名詞的人加以注意。（二十七年一月十二日掃蕩報）

抗日建國建軍之任務

陳誠

今天是總理逝世十三週年紀念，我們在沉痛的悼念中，想到國父生前偉大的革命經歷，最令人景仰的是他那堅苦卓絕，百折不撓，屢敗屢戰的大無畏之精神，這種精神，正是我們目前驅除倭寇復興民族的基礎，每個同胞同志都能繼承這種精神，則最後的勝利必屬於我們，回憶民國十四年的今天，正是革命軍東征到了勝敗存亡的生死關頭，當時前有東江敵人的負隅頑抗，後有廣州反動份子的搗亂，幾經苦戰，傷亡慘重，敵人的先鋒，已經迫近炮兵陣地，僅祇三百米遠，在這當兒，忽然傳來國父不起的惡耗，全軍自然哀痛萬分，然而每個同志絲毫沒有表示悲觀動搖，反而因此加倍警惕，格外奮勵，終於使戰局轉危為安，肅清了東江的反革命軍隊。

反觀今日之局勢，國難外侮雖達最嚴重之階段，但是我們自身的革命力量，無論在軍事上，政治上，與財政上，都遠勝於十四年時代，這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認的，在十四年時代，革命的武力僅祇兩個教導團，政治勢力尙遠未普及廣東全省，財政上更是拮据萬分，可是今日我們有數百萬的國軍，統一的政權和全民族的人力物力與財力，祇要我們堅決奮鬥，抗戰到底，絕無不成功之理！

若就軍事形勢而言，今日之局面，不僅遠勝於革命軍東征時代，而且較諸第一期對日抗戰時，更為優越，在第一期抗戰中，我們雖然失去了一部份土地，和幾個重要的城市，然而我們絕對沒有失敗，不但沒有失敗，實際上是得到了許多勝利，第一，牽制了敵人三十多個師團，使日本帝國主義歷來企圖以華制華，不戰而亡中國的陰謀，完全失敗，第二，半年來的苦戰，予敵以重大創傷，敵兵員死傷二十萬，資財消耗二十五億，終致敵人不得不放棄「速戰速決」的幻想，而改爲長期戰爭的準備，反之，在我們本身，却愈戰而愈強，第一，全體軍隊在抗戰中都走上了國家建軍的道路，第二，我們的國家政權真正完成了統一，第三，全國民衆的力量，在一個主義政府，一個領袖之下集中起來了。

在第二期作戰中，敵人之困難與痛苦，祇有一天一天的增加如一切補給運輸等等，在在都成問題，而且敵國內部的矛盾及其反戰空氣，亦足以使敵軍動搖崩潰，觀乎敵國總動員案與四十八億追加預算案之難產，可知日本軍閥和政黨間之相剋與摩擦，是如何的嚴重啊，正因爲敵人有如此困難與內在的矛盾，所以第二期作戰中敵我力量之對比，是完全改變了，同時，在戰略上的優越性，敵我也有了相對的轉變，在第一期抗戰中，我們是被動，敵人是主動，現在則我們開始處于主動地位，運用富于機動性之運動戰，迂迴敵人後方，予以各個擊破而殲滅之，最近山西戰事，我們真是「旗開得勝」，雖然

許多人祇看見皮毛，以為敵人表面上的進展，便是我們的危機，殊不知敵人此次攻晉之目的，是為着驅逐我們退過河南，乘我渡河之際，予以聚殲，然後他便能鞏固華北佔領地域，斷絕西北交通線，然而愚蠢的敵人，完全忽略了我們戰略上的改變，現在晉中三十餘師主力軍，未嘗有一兵一卒渡河，他們在山西一百零五縣的廣大地面上，（敵人所佔領的祇有三十餘縣的交通線），將展開大規模的運動戰，隨時隨地消滅敵人，同時我軍在平漢綫的積極行動，又截斷了晉東敵人的聯路，所以不論敵人到了黃河岸邊，甚或到了風陵渡口，我們都有絕大把握，使日寇在腹背受敵的情況下，殺得他片甲不留。

總之，今日對日抗戰，我們絕非爭一時一地之得失，而是爭最後的勝利，而且，我們不僅祇是為戰勝敵人，並且要達到抗日建國的目的，每個同胞同志都應時刻記着這一偉大的歷史任務，從每件工作中來求自己的反省，自問所言所行，是否違背這個標的，軍委會政治部自成立以來，即以此標的為工作邁進之方向，政治部除了整頓軍隊政訓，國民軍訓與對內對外宣傳工作以外，還要努力於改善政治，轉移風氣，服務社會等等事項，最近遵奉領袖的指示，政治部的工作已由近及遠，由小而大地着手進行，首先就武漢方面，在消極上要做到，（一）傷病兵的適當處理，（二）公務員腐敗生活之取締，（三）非衛戍部隊之撤調，（四）各後方機關及辦事處之嚴格限制與取締，（五）不正當與假民衆團體之整飭與取締，在積極方面，便是有計劃的為抗日與民衆自身健全而組織與訓練民

衆，一方面就前方與後方及都市與鄉村之性質不同，而分別進行，他方面，就社會階層之不同，使農工商學兵，有分別的組織，而對於青年的指導，尤其注重他們的出路與各種工作技能之訓練，凡此都是要使人爲抗日救國而努力，絕無一人苟且偷安，游手好閑，以致妨礙抗日，而爲民族國家之罪人。

時至今日，已絕無徬徨徘徊之餘地，任何顧盼猶豫，皆足以使民族運命重蹈宋明末葉「議論未定敵已渡河」之覆轍，全國同胞同志唯有堅定抗戰意志，同仇敵愾，精誠團結，絲毫不存依賴僥倖的心理，務以必勝的信念，在我革命領袖卽總理唯一革命承繼者的偉大領導之下，爭取最後的勝利，如此方不愧總理的忠實信徒，方不愧今日大家紀念總理的意義。（總理逝世十三週年紀念大會講）

總動員與國民道德

蔣方震

時至今日，全面抗戰的偉大序幕已經揭開，全國民衆惟有勇敢沉着，勉盡天責。大公報徵文及余，爰本斯義，與讀者諸君一談。

假如讀者有人問，今日國家大事，那一件實行起來最是簡單，我以為莫如現代各國的總動員，這只須一紙命令，而且命令只有短短兩句話：「命令動員以某月某日爲動員第一日」。假如再問這時候誰最忙碌，誰最閒暇，我可以回答說，全國人民個個忙碌，只有一位總司令一位參謀總長，却是極端的從容閒暇。

何以動員的命令是那樣簡單？這正是因爲動員的事務過於複雜；何以負責的軍事當軸是那樣從容？這正是因爲他們應該注意的事項過於繁多。

以上所說，還是指的歐戰以前情形，現在更進步了，動員令簡直只是「祖國危險」四個驚心的字樣，這只是一個符號，表示二十四小時內決定要下動員令了。至於從容閒暇的也不止是總司令和參謀總長，全國人民個個都是從容不迫，行無所事地履行他們應做的事。

試問國家到了最危急的時候，何以國民都能這般從容？這就是平時準備有素，而且

這種平時準備有一個根本原則，就是人人自己知道：「一旦祖國危難，我們大家，應該如此這般做去」。

這種「某人做某事」的規定，從前只限於軍人和一部分有關係的官吏和實業家，現在却擴充到了全國國民以至小孩子，老太婆，不信請到法國鄉間找一位小學校長或教員，他就曾告訴你動員時候，他的學生各人應做什麼工作，而且這種工作一概從他本身本家，本村做起點，決非勉強去做平時未嘗習見，未嘗經驗的事情，所以無論心理怎樣緊張，感情怎樣熱烈，人人都是腳踏實地，手做實事。

要做到這樣秩然不紊的局面，不僅政府應予準備，人民自己也應有準備任何一件作難做的事，倘能自己覺悟，早事預備，總可以達到目的，總有解決辦法。任何一件容易的事，若要猝然做到，總有種種意外的困難發生。外國人本領何嘗廣大，只是早有準備而已；中國人何嘗不愛秩序，何嘗沒有本領，不過是臨渴掘井而已。

總之，在現代國家，關於動員一類事件，政府與人民各有職責。國家本有一種崇高的義務，應於平時指導人民，使他們個個知道非常時期每人應該做什麼事情。這一點不僅在國防作戰上有非常的重要，在國民道德上也有很大的意義。這至少使人民有事實幹，無暇空論。

我們研究中外民族興亡的歷史，可知一個民族若在復興的過程中，外來的壓迫只有

使整個民族日臻于統一，日趨於團結，有如十九世紀的意大利德意志諸民族；而一個民族在殄落期間，每發生外禍愈烈，內鬩愈甚的現象，像兩宋末造，以及波蘭淪落的前夕，莫不顯然如此。這時候最不好的亡國之兆，就是人人不對自己負責，只知責備他人，不肯黽勉自己，所以國民批評政府，政府諉罪國民，甲部埋怨乙部，丙省彈射丁省，大家推來推去，結果把國家主權推給了敵人去！

大概一個民族處於順境時代，國家與人民團結是利害一致，處於逆境時代，每多利害的衝突。毀家紓難的精神只能期望於極少數，不能以之律大多數；只能求之於一時，不能求之於永久。所以國家本身要不指示人民各種切實的救國途徑，則熱心的人民不明白時代國家的需要，就無從發展他們的能力。而社會上各種擾亂以起。因為人是有天然的活動性，不向上則向下，不為公共即為自己，而欲羣衆統一，只能求之事實，不能求之理論。

德國民族復興時期名將哥爾紫關於大軍統帥的議論，特別可以錄給大家做反省的材料。他這樣說道：

「俯仰今古，一切軍事會議的結果，無非給我們這個教訓，即平時雖應十分重視「理智」，到了戰時「意志」却更為重要。軍事會議固然把有經驗，有見識的人士集合一堂，收羣策之效，但腓特烈大王獨加嚴禁，以為此風斷不可長。他乃是老於行伍，深於

閱歷，明知會議每易發生推諉責任的惡習，結果定是胆小者佔了優勢。把許多有經驗人聚在一起，只會看出無數的弱點，對於當前事實却毫無裨益，徒使負責的將帥重增一番精神上的不安而已。

受過軍事教育，且有戰事經驗的軍人，若不與以恪守的職務，只教參預普泛的討論，尙且發生這樣大的流弊，何況數累千萬的平常人民呢？

人們或許要問現在各國不是也有所謂國防會議，軍事會議麼；自然，不過這個會議制度，百年來經過一大進步，已從商量的機關變而為命令的機關，譬如參謀部長下令調百萬人到前方去，他要調查自己有多少火車，多少船隻，這就有交通部接洽的必要；譬如實業部長下令要開發荒地，也須問問軍人，這塊土地開後對於軍事上有何影響，同時每一件國家大事，都不是一年半載所能做到，所以時間上緩急先後的權衡，凡軍事家外交家對於負責當局都有重要的進言之責。

非常時期中，平常人民應做的事情雖然不勝枚舉，總以物質的生產製造最爲重要，所以歐洲總動員，萬事以工業動員爲中心。今日中國工業原不發達。戰期更形艱難，惟有以組織的人力來替代機械的馬力，也就是以精神補物質的不足。印度聖雄甘地的織布運動，就是一個例子。總而言之，凡我同胞不可妄自菲薄，以爲沒有一事可做，我們只教認清目標，竭盡心力以赴，總比空言擾攘爲佳。我們應該少開一次會議。多織幾匹土

布；少談一些是非，多種幾石米穀。事情雖似迂遠，功效却最直捷。

速決與持久

蔣百里

法國戰術家認為攻擊有兩個基礎條件，一為運動，一為射擊（火力）。

飛機出現以還，技術上的進步一日千里，如今空軍已單獨成爲一個作戰單位；同時向來最缺乏運動性的遲緩的砲兵，經過摩托化並有坦克戰車的發明以後，牠的速度也超過了從前幾十倍。空軍中的重轟炸機，將來速度可與驅逐機相等，而驅逐機的速度則因人身生理的限制，不能更有多大的進步，所以歐戰後的軍事發展，專在運動性方面，而火力又是跟隨運動性的增加而增加。

單從戰鬥的工具說來，各國都是向着「速」字上用功夫，因此現代戰術戰略的趨勢，也自然向速決方面走去。但從整個國家的立場說來即從所謂「全民戰爭」的範圍來說，到各國，尤其持久戰失敗的德國，就注重在「持久」兩字，風行一世的自給主義是持久戰的根本政策。不過，文章是要從反面看的。我們不能據此認爲各國如今以守勢爲國策。須知她們一方面高談持久，然而各種戰鬥方式，莫不趨向速決的方面，而持久却是達到速決的一個門徑。

全民戰爭的痛苦是太深了，負擔是太重了，所以政治家對於民衆的要求雖爲持久，

軍事家對於國家的義務則取速決。不用說空軍戰鬥是速決，海軍戰鬥亦然如此，一番會戰每可決定全局的勝敗，戰鬥中有韌強性的就只有陸戰。然而現在陸戰的工具一天快速一天，陸戰裝備的重心完全集中在所謂快速師團。牠的戰術，亦即牠的特性，就在出奇制勝。再看現在各國的動員律也是朝着速決的方向走。德法兩國國境建築的要塞，目的在掩護動員，決不想在那裏死守。當年凡爾敦要塞的北方區，正留有一個攻勢地帶。如今德國積極修築高速度行車的國道，也正在守勢中間寄託着一種攻勢。

我們可以說速決主義乃現在實際軍人所追求的目標，只是從這種戰略上的速決中間，發現了軍制亦即國力上的持久問題。須知空海兩軍都是以技術的優越而決定戰鬥的勝利。一國的經濟力量，能否與技術上的發明亦步亦趨，乃軍備上的一個根本問題。譬如阿比西尼亞戰爭時期的義大利飛機，現在已成爲明日黃花，不能與英國爭競，若將這些飛機一律取消，換上一種現在最理想的構造，經濟上不勝負担；若用局部改良的輪替法，又怕敵方改良得快，將一輩子趕不上人家。所以現在軍備改良有一個主義，名爲「發明惟恐落後，製造惟恐爭先。」就因爲國力跟不上技術，換一種砲動輒幾千門，換一種飛機動輒幾百架，真所謂擲黃金于虛牝，誰都受不了。

掌理國政的人假如輕輕失去了軍事優勢的時機，再要重新恢復優勢，至少須待五年乃至十年以上。照我個人研究，歷史上陸軍的強大，不能保持二十年，空軍的強大不能

保持五年，比較上優勢最易持久的還是海軍。這因爲主力艦的建造最費時間，而且海上武力又是反映着一國的經濟力量與民族傳統，並非五年十年的近功。

總之，現在歐洲軍事的方向固然趨於速決，而政治的痛苦與經濟的困難則在於不能持久。他們苦心孤詣的經營便在尋取速決與持久的平衡，要從此中發現一條新路。

他們要求速決所以不能不講持久：速決是目的，持久是手段。

現在拿歐洲這一種實況來研究中國應循的途徑，我們知道歐洲人從速決主義下發現了持久的困難與必要性，至於我們中國目前既須作持久戰，我們就應該在持久這個決心下，來研究速決的「速」之條件。歐戰法國凡爾敦所以能長久固守的原因，並非由於死守，而在於法國人能利用運動戰的原則，將守線隨時移動，死守一個陣綫，無論設備如何鞏固，在今日火力下仍可將整固陣線頃刻毀滅。去年比爾波鐵環的防禦，建築的時間費去九十小時，而摧毀的時間的只經九小時。

當年德法火力同等，而法國守勢戰尙非扼據一線的死守，何況火力平常不佔優勢的我國。所以在一個持久戰區之內，反是用了運動戰可達持久目的。簡言之，這便是所謂「以攻爲守。」假如拘之於形式上持久的一線死守，是必然不能達到持久之目的。現在德國有步步爲營的退却法，就是寓死守於運動之中。

一個部隊的火力要與運動力同等，沒有運動力的火力，可名之爲「死火力」，所以

要達到持久固守之目的，應以增加運動性為唯一條件。前方作戰的部隊至少要能够自己指揮後方的給養。我們裝備完全的步兵團差不多與德國步兵團相像。但德國步兵團後方直屬的車輛，就有一百三十輛之多，假如每團加上防禦戰車，更須增加七十餘輛汽車，才可以使一團的火力得到適當的發展與運用。至於一師作戰單位的大輜重與砲兵輜重都沒有算在其中。

遠適異國不知戰鬥的實際情形，所以一切不敢妄揣，不過我以為我們固然要求持久戰，但其先決條件，便是要使軍備增加運動性，因為我們要以持久為目的，須以速決為手段。

歐洲的問題是不久則不速，我們的問題是不速則不久。（一九三八年一月二十六日於柏林）

西戰場之形勢

張其昀

自從神聖的民族自由戰爭揭幕以後，戰場可以分爲三個區域，在河北平原曰北戰場，在山西高原曰西戰場，在江南平原曰南戰場。也有人稱爲東戰場，但我們願保留給山東半島。日本大陸政策固屬永無止境，但因華北諸省可與偽國打成一片，自必更爲注重。在西戰場方面，一路沿平綏線可出河套，一路循同蒲線可達關中，在今日更有國際的意義。山西高原山谷崎嶇，易守難攻，便於爭奇競險，在戰略上尤饒有價值。自八月下旬起，張垣南口大同雁門諸要地，相繼陷落，北方震動。至九月下旬，我軍有平型關之捷，掃蕩日軍精銳的第五師團，爲華北戰事第一次大勝利，足證我軍對於軍事地理確有深刻認識，給予國民以極大的興奮。自是以後，晉北陣線不免常有入出，但此類「聚而殲之」「平型關式」的戰略，相信可以層出不已，軍事專家嘗稱平型關一役，已開華北戰事的機運，而爲華北戰場的關鍵，誠非誇言。本篇試從歷史地理學的觀察，就西戰場的強形巨勢，略加說明。

平型關爲內長城要塞之一，內長城對外長城而言，在內外長城之間爲桑乾河盆地。欲知平型關之位置，當先述桑乾河盆地。此次華北戰事以蘆溝橋爲導綫，橋跨永定河上

，桑乾河即永定河之上流，是河含沙甚多，又稱渾河，一名小黃河。考中國文化之起源，小黃河似較黃河爲尤古，我四萬萬同胞皆自稱爲黃帝子孫，黃帝定都涿鹿，即今察哈爾省涿鹿縣，在桑乾河北岸。黃帝發明指南車，與蚩尤戰，大敗之，是爲中國歷史之曙光，并爲中國科學之萌芽。涿鹿縣東有懷來縣，相傳黃帝大會諸侯，合符釜山，即在其城北。近年來中國史學界疑古之風甚盛，黃帝子孫一語似將成爲問題。但最近考古發掘之結果，證明史記殷本紀所載世系，全是實錄，我們祖先宅居於燕山邱陵已有二十萬年之久。可知中國古史決非悠謬之談，桑乾盆地當可信爲中國文化之發達地。我們要恢復黃帝故都，要還我北平。

數千年來桑乾盆地之史蹟，茲不備舉，要之其地始終爲邊防用武之地。自北而南，大致可分三線，陰山之長城代表國防第一線，盆地北邊的外長城爲第二線，盆地南邊的內長城爲第三線。桑乾盆地分隸晉察二省，在地理上實屬一區，其都市分佈皆與桑乾河諸支流有關，在御河者曰大同，在壺流河者曰蔚縣，在洋河者曰張家口宣化，在媯河者曰懷來，涿鹿則臨幹流。前人謂北平之防，左薊遼而右宣大，蓋明代以宣化大同爲邊防重鎮，合稱「宣大」。宣化乃古之上谷，大同乃古之雲中，故有「雲谷」之名。雲谷區域，山嶺環列，可稱四塞，內外長城沿山而築，北山在張垣大同之北者曰野狐嶺，南山在河北境曰燕山，在山西境曰恆山。長城古址變遷甚多，今日之長城實爲明代之牆邊

，其在雲谷區者，大都分爲明嘉靖年間總督宣大軍務翁萬達所建築。距今已四百年。當時設險置關，據高臨深，守望瞭然，種種擘畫，勞心焦思，曲盡其宜，其規模猶今人所謂集團要塞。

內長城之關塞，自東而西，主要者有九：爲便利計，可稱爲東三關，卽居庸關，紫荆關，倒馬關；中三關卽飛狐口，平型關，茹越口；西三關卽雁門關，寧武關與偏關，平型關居九關之中堅，屬山西繁峙縣，但距靈邱縣城較近，靈邱之北有廣靈縣，靈字之義相傳係紀念趙武靈王，趙武靈王胡服騎射，北却強胡，其葬地卽在平型關附近。中國文化源遠流長，過關塞輒令人思及古代之民族英雄。

平型關之北爲恆山，其南爲五台山，皆屬太行山脈之支阜。戰國策稱恆山爲天下之脊，蓋其地爲重要分水嶺，北流者爲桑乾河系統，東流者爲大清河系統，西流者爲滹沱河之正源，皆自平型關附近迂迴分歧，最後以天津爲衆流歸宿之地。山間通路皆沿谿谷而行，此關兼顧各方，當出入之要衝。型字或作礪，殆與井陘關之陘相通太行山脈係斷層作用而成，地勢急轉直下，成爲峻坂，上下交通至爲艱阻，惟賴山溝以事攀援。此類峻急之山溝，在燕晉稱之曰陘，在陝西稱之曰谷。平字古亦作瓶，蓋喻山溝愈進愈窄，如瓶塞然，如咽喉然。此關位於冀察晉三省邊境，道路由此輻射而出，實爲主要之戰略地帶。據此樞紐，復與其他要塞相爲犄角，對於冀察晉綏諸省之軍事，實有聯絡策應之

妙用，誠爲控扼要地。

內長城之東三關，曰居庸紫荆倒馬，後二者合稱爲金馬二關（紫荆一名金坂關，卽古之蒲陰陁）均在河北省涞源縣境，與平型關有唇齒相依之勢。涞水經紫荆關入易水，沿流而下可至平漢路上之涿縣。易水下流爲白溝河，一名拒馬河，北宋時與契丹以此河爲界，故亦稱界河。昔蒙古滅金，攻居庸未下，乃以奇兵出紫荆關轉自南口攻居庸破之，所謂，「勁卒擣居庸，北拊其背，大軍出紫荆，南扼其吭，」而北平遂不能守。澧水出倒馬關入唐縣，稱爲唐河，與易水均爲大清河之支流。定縣介於保定正定之間。後魏時建都大同，欲開一捷徑南達定縣，於是發卒五萬人，治直道，名曰靈邱道，至今尙可通行大車，故由金馬二關出師，可以截斷平漢交通，不但威脅北平，卽保定與正定亦皆受壓迫，敵雖深入，而有歸路斷絕之危險。敵人有鑒於此，欲急攻平型，我軍給予致命的打擊，故此役確爲華北戰事的轉機。

由平型關北經靈邱廣靈二縣，至察哈爾省之蔚縣，自蔚縣至宣化亦爲大道。丁文江君曾建議由宣化涿鹿（距平綏路下花園站三十里）修築支路直達廣靈，則蔚廣二縣煤田之發達，未可限量云。現在有宣蔚公路，沿此路進克宣化，則切斷平綏路之交通。宣化居三口（南口張家口獨石口）之中心，不但收復察南，且可出獨石口以攻多倫。蔚縣北枕桑乾，中帶壺流，在前代有「鐵城」之目，倒馬關古稱鴻之塞，亦有「鐵關」之名。由鉄

城趨鐵關，中經飛狐口，即古之飛狐道。前人詩云：「漢代飛狐道，今朝倒馬關」。又云：「昔聞飛狐口，奇兵入擣虛。」靈邱道為燕晉交通之間道，飛狐道為燕察交通之間道，三省邊區，關山嚴固，誠為軍事活動之中樞。

宣化既失，敵人由南北二道圖我山西，北由大同窺雁門，當大道之衝，南由蔚縣趨平型，襲雁門之後。蓋由平型西進繁峙代縣，則雁門關腹背受敵，而太原不得安枕。故平型雁門一線，在晉北邊防特為重要，鎮戍遺跡沿山錯列。後魏建都大同，奄有恆代，規取河北，蠶食河南，而中國倒懸之勢成。宋以恒山與遼人分路，普及民間之楊令公（業）及其子楊六郎（延昭）之歷史小說，其背景即在此線。楊業屯兵備遼，屢破強敵，雁門之戰，重傷被擒，三日不食死，故永為後世國民所哀慕與景仰。內外長城都是中國民族血和肉所築成的。前文言靈邱道以靈邱或平型關為中心，由此經桑乾盆地以達大同，則可以解歸綏之圍。蓋由靈邱廣靈北至天鎮陽高，即可截斷宣化與大同之聯絡，宣大已入我手，方可收復綏遠。昔漢破匈奴，唐平突厥，皆由晉北以赴塞外，其用兵路線尙可覆按。

日本山梨中將曾說：「中國古籍中關於戰略之學高深精妙，有非德國近代戰略諸書所能望其項背者。」（見杜錫珪考察列強海軍報告，但是這些戰略不是憑空杜撰的，是從我祖國偉大山河磨練出來的。我們承受了祖先遺傳下來的偉大山河，并承受了祖先遺

傳下來的戰略戰術，終于有平型關的大捷。我們要繼續作「平型關式」的殲滅戰，如黃帝之滅蚩尤，方不愧為黃帝子孫。平型關一帶的集團要塞，是華北戰場鎖鑰所寄，亦是冀察晉綏四省軍事上的樞要，唐代安史之亂，河北淪陷，幸太原無恙，故李光弼郭子儀輩得藉山西為根據，卒收恢復之功，而成中興之業。古人偉大的榜樣，即今人努力的目標，我們全體國民對於前方抗戰的愛國健兒，尤其是參與平型關戰役的戰士，要呈獻我們最深摯的感激和敬禮。（二十六年十一月七日大公報）

義軍的歷史教訓

陶希聖

在國家危急的時候，民衆或由政府召集，或由自己發動，組織義勇軍，救護國家，或保衛鄉里，或乘機革命。這種事實，在中國歷史上是很多見的。歷史的教訓，往往含有寶貴的意義。在今日這樣的危急的時候，大都市與交通幹線都有動搖或斷絕的形勢。政府召集義軍以及民衆自起義軍的日子到了。我想分三點來略說歷史的教訓。第一點是集合的方法。第二點是發展的危機。第三是義軍在全體戰爭裡面的價值。

第一·義軍的集合方法

無論是政府召集或由民衆自己發動，義軍的起事一定是民衆自願，決不是外力強制得來的。外力強制，往往得到相反的結果。如用抽丁的方法來組織義軍，民衆必逃亡，如恐不及，即令逃亡不了，他們一定沒有集合作戰的決心。到了政府強制力不能到達的時候，他們就會散亡，或竟投敵人，受招安。

義軍集合的動機，由歷史的事實看來，不外乎下面的幾種。第一種是免稅的要求。這種方法來號召義軍，最顯明的只有北宋末年的一次。在北宋靖康之變，女真國由東北打過了黃河，陷落了首都汴梁。這時候政府下令召集義軍。政府頒布一種法令，如果人

民組織巡社，一律免除兩稅和丁身錢。一時河北山東各地，集合的民衆不下三四十萬。巡社的義軍，一律頭纏紅巾，以爲標幟，叫做紅巾軍。

第二種是官位的要求。多數人要求免除負擔，少數人要求官位。這兩種要求有時只是一件事。如唐代安史之亂，政府發了大批的告身，號召民軍。在當時，告身是官位的憑據，也就是免稅的憑據。稅制在當時是以丁作單位的，所以有這種方法號召義軍。稅制已變成資產爲單位以後，這種方法後行不通了。在北宋末年，少數有官位要求的人，號召義軍。當時有句話很流行，就是「要做官，殺人放火受招安」張俊的軍隊，岳飛的軍隊，大都是受招安的民軍。岳飛招安的茶寇，尤其是勇敢善戰。韓世忠從招安的人裏面選出精壯的部份，編爲背嵬軍。張俊要商賈岳飛瓜分這支軍隊，岳飛拒斷了他。後來張俊便幫助秦檜害死岳飛。這都是用官位號召民軍的故事。

第三種是避難和保鄉，這可以說是義軍起事最普遍最強烈的動機。在中國史上，每一次動亂，必有大量民軍起來。如爲內亂，則民軍可分兩種。一種是打家劫舍的貧民軍。一種是保鄉保家的豪家軍。西漢末年，關中豪強「聚衆保營」。他們受郭伋的聯絡，全體歸附劉秀。後漢末年，中原聚衆自保的豪傑，如李典，許褚，以至於荀彧，都歸附了曹操。下至于元末的劉基，勸朱元璋收合各地的聚衆自保的人士。這都是在內亂之中，由于避難和保鄉而構成義軍的實例。

如爲外患，民衆的聚來自保，多沒有階級的差別，成爲全民的勢力。晉代永嘉之亂，胡人由陝西甘肅山西入據中原。除王浚劉琨各以地方長官保守河北山西一部而外，河淮一帶到處都是寨子，在當時叫做「塢」。塢有塢主，大抵是兩種的人，一是蒙宗大族首領，二是平民的壯年幹部。東晉政府往往就地授塢主以太守刺史的名義，讓他們就地自衛。祖逖從京口渡江入淮河流域，號召塢民，成立有名的淮南軍，後來叫做北府兵。北宋靖康之亂，太行山五馬山及河北山東各地的義軍，到處結成山水忠義寨。太行山最有名的集團，叫做忠義社，岳飛以韓家的佃農，堅苦奮鬥，成爲忠義社的一位首領。岳飛在鄂州一帶，時常想恢復中原，就是指望太行山義軍的響應。五馬山的義軍首領馬攢，領導義軍大小五十餘戰。因爲他歸附過繡王，爲高宗所忌，得不到政府的接濟，全軍終于覆沒。太行山義軍達三十萬人。這些人大抵可分爲各種動機。如逃避金兵的蹂躪，逃避全國的剪髮令，逃避債務。甚至女真人自己也因爲逃債及逃避國主的屠殺，參加太行山寨。這裏的義軍有八十年的歷史，女真人受了不少的牽制。

上面說的各種動機，前兩種在今日是不存在的，唯有第三種動機是今日應當加倍注意的。今日戰區難民，以及逃避兵役的難民，就是最好的義軍材料。倘若政府總以爲抽丁是組成軍隊的唯一辦法，我想這往往是轉化壯丁爲難民。假使政府任聽戰區壯丁逃難，我想這往往增加難民到安全地帶不能負擔的境遇。大金國末年，蒙古從河北山西陝西三

路來攻，所有戰區的難民與軍報通通退到河南。一時河南秩序大亂，加稅徵糧，以致亡國。這是最慘痛的先例。現在必須制止難民向西逃亡。在各戰區附近指出避難地帶。讓地方人士，藉軍隊與保安隊的掩護，聚衆自保。訓練壯丁，保衛地方，訓練成熟，相機出擊。不廢生產，易於生活。不增加後方的負擔。這樣一來，可以轉化難民爲軍隊。

第二·義軍發展的危機

義軍屯聚，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其中有最危險的成分。這個成分如果發展，就要生悲痛的結果。現在舉兩個實例來看看。

第一個實例是在大金國的末年。那時候，山東江蘇一帶，有一種民軍，叫做紅巾。此外還有一種叫做紅襖，一種叫做花帽。這些民軍，在初是反金助宋。他們以李全夫婦爲領袖，投了宋國。後來反覆無常，又投金國。一時受他們騷擾的地帶，豪家大族自動組成義軍來對抗他們。這些義軍裏面最大一支是山東的樂清社。社裏有壯年二十多萬人，延亙十幾縣的地面。蒙古木華梨的軍隊到了山東，樂清社投了蒙古。他們的首領史天倪兄弟叔姪十幾人都成了元代開國的大將。元代成功以後，他們也都繳了械下野去了。

第二個實例是明末。那時候，李闖從陝西起事。打遍了黃河流域。當時的人很希望他們能共同抗滿，不要自相殘殺。不料想他們顧不了民族存亡，專門殺害自己的同胞，打倒自己的政府。連他們內裏在河南最有號召力的李公子也不能容受，被他們殘殺了。

那些軍將和社會上恐懼他們的人物，紛紛投了滿人。吳三桂引清兵入關，就是階級分化的惡果。其實，李闖的羣衆何嘗沒有民族思想？李闖死後，二十萬羣衆在何騰蛟領導之下，爲抗滿復明，轉戰中原將近十年之久。從兩個實例看來，民族與階級兩件事是可以一致，也可以衝突的。如在民族危亡之時，民衆的組織者，爲了民族的團結，可以收自保與恢復的大功，如果他們自相分化，危亡必定加緊加快了。如今遇作義軍工作，這一點是最距離最緊急的。一個不好，銅駝就要生荆棘了。

第三·義軍在全體作戰中的價值

義勇困民軍的用法有兩種：一是使民衆就地自衛，一是轉化他們爲遠征軍。這兩種用法，第一種是基本的用法。民軍離開自己的鄉里，就失却他的基本的作用。他的戰鬥力既不如正規軍，又失去了生產與熟悉地形的長處。所以義軍只能就地作戰。如由其中抽出最精的部份補充正規軍是可以的。如把他們全作爲正規軍，就算失策。

義軍在從前的價值是很大的，現在就小得多了。從前的社會經濟是以農村爲基本而能夠自給自足。在這種社會經濟條件之下，義軍容易起來，容易自保，現在農村已不能自給自足了。失了城市以後，鄉村獨自保守，只可一時，不能長久。這是其一。其二，從前軍隊的是刀槍弓箭，民間可以自造。所以民事容易起來，容易補充。現在軍隊用槍砲用飛機。民間無法製造補充這些東西，各地分散而求自保，是做不到的了。

義勇民軍的價值，在今日是遠不及從前。義勇民軍必須與正規軍配合始可作戰。這
是大家要知道的。

(二十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掃蕩報)

思想的武裝與行動的武裝

——雪恥與兵役宣傳特刊獻詞——

康 澤

雪恥與兵役好像是兩件事，但實際上却正是一件事，我們可以簡單明瞭地說，雪恥是兵役的目的，兵役是雪恥的方法。

在目前對倭抗戰的艱鉅過程中，大家都知道我們需要全國家全民族的總動員，以爭取最後的勝利。所謂全國總動員或全民總動員，固然需要的條件甚多，但實行全民皆兵，實是總動員的最重要形態之一。要做到全民皆兵，便非實行兵役法，要全國適齡的同胞都服兵役不可。

雪恥與兵役擴大宣傳週籌備會前兩日要我作廣播講演，我曾說過雪恥是「知」，兵役是「行」，而「即知即行」乃是今日抗戰建國的要道，願乘此機會更引申我的意見。

一個人或一個民族的生活態度即行動實踐，必以他或他們的思想為指導的南針，在今日我們和日本帝國主義者作殊死戰的時候，因為我們全民族的思想都統一在三民主義和抗戰建國綱領之下，所以我們全民族的行動都統一在最高領袖領導之下，而這種思

想和行動應說是以什麼來表現得最明白呢？一言以蔽之，服兵役。

服兵役是我們行動實踐的武裝，而其目的則是雪恥。以雪恥來推動兵役的普遍，正是用我們的思想來指導我們的行動，用我們的「思想武裝」來完成我們的「行動武裝」，所以我說雪恥與兵役實際上正是一件事。

我們要雪恥，必先要知恥，明恥。孔子說，「知恥近乎勇」，又說「明恥教戰」，這話是很可玩味的。由這一點推索，我們在一方面，可以知道思想對於行動指導的關係是何等重要；在另一方面，更可知：我們要使服兵役的效果確實，要使總動員的力量雄厚，換一句話，要使我们確能獲得最後勝利，必先要使全國同胞知恥明恥，知道敵人對我們土地財產掠奪，對我們父老兄弟諸姊妹殺戮姦淫，實是我們民族國家的奇恥。大家都知道，都明白了，自然能咬緊牙關立定志向，在政府與領袖領導之下，一致和敵人拚死命。大家都能這樣做，奇恥纔可以雪，民族纔可以復興。

有人說，總理主張「知難行易」，因此，不知道敵人欺侮我們的奇恥，也照樣可以服兵役，所謂「不知亦能行」便是此意，這話固然不錯，但是總理正因為要證明知難行易學說，所以在「不知亦能行」之外，更確說「能知更能行」，「過去那些不知道自己與國家民族關係的，不知道自己身家的利害禍福原是與國家民族不能分離的一般老百姓們，在募兵制度盛行時代，雖然也未必不能打仗，但如果能够知道了之後，豈不更會

增加作戰的勇氣和力量嗎！尤其是在實行徵兵的現在，讓大家都知道敵人的兇殘暴虐，滅絕人性，豈不更能促成全民皆兵的實現，和軍隊素質的改良嗎！

在大家都「知」了之後，必須即刻要「行」，惟有即知即行，纔不是空知，纔不致胡行，知道要雪恥，便去服兵役，而在服兵役的工作中，時時不忘我們這種神聖的使命，就是爲了要雪國家民族的奇恥，全國同胞都這樣做，自然可以取得「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真實保證。

說到這裏，我們知道：惟有思想的武裝與實踐的武裝的完全配合，即雪恥與兵役這兩大運動在「即知即行」口號之下的完全統一，纔是今日我們全國上下應當努力邁進的大路，尤其是熱心教育和民衆組訓宣傳的同志們，要認清這條大路，攜手共進，以走向實現三民主義的光明的前途。

不過，我們必須更了解兩點：一是「思想武裝」的外形是雪恥，而內容的實質是純正的全部 總理遺教和 總裁的指示，不把握這內容的實質，便不會製成我們的完整「思想武裝」，亦即仍然不能真正知恥明恥以求雪恥。其次，則是「行動武裝」的外形是兵役，而其內容的實質，基於前一點，必須接受政府統一指揮和命令來做，如果把什麼「民衆自動武裝起來」當作我們「行動武裝」的實質，那便也犯了嚴重的錯誤。和建國大道「南轅北轍」了。

「即知即行，雪恥建國，惟服兵役，方是良策，」全國適合兵役年齡的同胞，將我前面所述兩點考慮之後，請以這十六個字來自勉互勉，替國家民族子孫開拓一個偉大的將來！（載五月九日掃蕩報）

抗戰建國綱領的性質與精神

陶希聖

這一次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發表了一個具有極重大意義的宣言，和一個博大精深的抗戰建國綱領，可以說是中華民國的生存和發展的唯一規則準繩。我們依照這個抗戰建國綱領去作，不單是在抗戰時期的各種問題，都有解決的方法，就是抗戰結束以後的國家社會各種問題，也都可以得到解決。所以這一個綱領，無論在教育方面，軍事政治方面，或社會經濟方面，都是今後的一個規範，一個準繩。在教育方面，尤其應當根據抗戰建國綱領來教育並訓導青年，使全國青年的意志和行動，都能集中統一，充分發揮國民道德的精神，努力從事於科學的研討，使他們成爲抗戰與建國的偉大任務中的中堅份子。

關於抗戰建國綱領，我想分成兩點來說明。第一點是抗戰建國綱領的性質，第二點是抗戰建國綱領的內容的要點。

第一點：抗戰建國綱領的性質是怎樣呢？

對於這一點，本是沒有什麼問題的。綱領公佈之後，大家都遵守並執行這一個規則

準繩，本沒有絲毫懷疑和懈怠。不過如果有人提出問題，問這個綱領的性質究竟怎樣？則我們可以分作三方面來加以解釋。

一，自法律的觀點來看綱領的地位。在法律上，抗戰建國綱領是由國民政府執行的。這個綱領是中國國民黨對於國民政府指導的原則，是國民政府今後法令與行政處分的根據。至於全國國民對於國民政府，是人民與政府的關係。就是說，是一個權力服從的關係。國民政府頒佈的法律，是全國國民應當服從的法律，國民政府的行政處分，是全國國民應當遵守的處分。所以在國民政府之下，無論是那一個階級，那一個種職業，或那一個民族，那一個宗教，都是隸屬於一個國家主權之下的國民，沒有一個人在這個政府以外存在。假如說在中國領土以內，有人可以在國民政府的法令以外存在，那只有北平和南京的偽政府，以及東北的傀儡國，而這些都是法律所不許可的。這種存在，不獨為中國全國人民所不承認，就是世界各國也都加以否認。在中華民國領土以內，國家只有一個，國家之外，沒有國家，國家之內，沒有國家。北平南京偽政府雖然希望這樣做，北平南京的人民仍然是國民政府之下的人民，不願這樣做。總之，全國國民對於國民政府是一個權力服從的關係，國民政府又是接受中國國民黨的指導原則。這個原則就是國民政府法令與處分的根據。國民政府的法令與處分的根據，也就是全國國民應當絕對服從的了。

二，自政治的觀點來看綱領的使命 就法律立場言，國民政府是中國唯一的政府，中國國民黨又是指導國民政府的政黨，所以中國國民黨的決議案，交給國民政府執行，全國國民必當接受遵守，現在再就政府方面言之，抗戰建國的工作，是國民政府所領導，也就是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爲什麼中國國民黨領導這一個關乎全國國民生命存亡，和關乎國家民族前途的抗戰建國工作？我們知道，如果中國不抗戰，我們的國家生命就不能繼續下去。不積極從事於建國，中國就不能構成一個現代的民族國家。換句話說，這次的偉大工作，要一方面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一方面要從抗戰中打出一個現代民族國家。從抗戰中建設現代民族國家，以及維持國家民族生命的抗戰，是由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爲國民政府所執行，同時也就是中國國民每個人所應盡的職責。我們沒有方法說這場戰爭是日本人來打中國國民黨，只有日本人常常是作這一種說法，他們用飛機撒傳單，他們在他們本國報紙上，都說他們只是要攻擊國民黨，甚至在北平，兩三年以來，他們都如此說，他們只不要國民黨存在，其他都可以存在。因爲中國國民黨是維護中國國家民族的利益，是領導全國國民抗日的政府，不但不能滿足他侵略的野心，反而給他們以嚴重的打擊，因此他們就只好想出些離間國民感情意志的言論，拿來削弱我們抗戰的力量。我們都知道：假如國民黨國民政府不能存在，只有那些不抗戰不建國的團體組織能够存在，這豈不是中華民國已被滅亡了！

現在也有人覺得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如果失敗，他們還可以存在。也還有人他們雖不希望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失敗，但他們同時又設想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失敗以後，他們如何自尋出路的問題。這種思想，都是極嚴重的錯誤思想。要曉得如果國民黨與國民政府失敗，就是國家和民族的失敗與滅亡。試問國家滅亡以後，還能容許局部的個體可以獨立自主的存在嗎？所以在政治上抗戰與建國，乃是全國國民所共有的職責，及必須共同擔負的任務。所以，在現在中國國民黨，國民政府，和中華民國，三者之間已經沒有方法分開。只有日本人才希望這三者分開。他說中華民國是中華民國，國民黨又是國民黨，他想在這樣分開之後，好用割裂與傀儡的方法來滅亡中國。根據以上的理論，我們就須明白國民政府中國國民黨與中華民國之三位一體的絕不可分性。我們在積極方面，要絕對服從遵行中國國民黨所領導的抗戰建國工作，以及指導這個工作的綱領。消極的方面，我們要認識中國國民黨的失敗，就是中華民國的失敗，中國國民黨的滅亡，就是中華民國的滅亡。

三，從綱領本身看出它的期待——就抗戰建國綱領本身，我們引出兩段話來。第一段話是這次臨時代表大會宣言中說的。大意是：爲了實現三民主義，爲了國家民族的復興，希望全國有志之士，一致加入中國國民黨共同奮鬥。當初爲欲推翻滿清的專制政治，國內有志之士一致加入同盟會，卒將二百餘年的滿清政府推倒，其後爲欲打倒軍閥，完

成國家的統一，集合全國有志之士於中國國民黨中，遂又有北伐的成功，現在的工作比推翻滿清比北伐更加艱難重大，這一個艱難重大的工作，尤須有全國有志之士羣起加入，同心戮力。

第二段話就是抗戰建國綱領的前文，抗戰建國綱領的前文，要求全國國民不分界限，一致從事於抗戰建國的工作。中國國民黨爲了對抗日本帝國主義，爲了建設現代民族國家，一面把黨公開於全國國民之前，希望有志之士加入，共同擔任這個偉大的抗戰建國的使命。一面爲全國國民訂立一個抗戰建國的綱領，以爲全國人民的規則準繩。

因此，我們可以說，中國國民黨與全國國民之間，已沒有界限。中國國民黨現在既是在客觀上與中華民國成爲一體，則任何意見的國民，任何利害關係的國民，只要有抗戰的思想與決心，有建國的思想與決心，都可以加入中國國民黨，都可以按照抗戰建國綱領而工作。這一個綱領的本身，乃是公開的，舉國一致性質的綱領。

第二點：抗戰建國綱領內容的要點

抗戰建國綱領的內容，在短短的時間內是沒有方法能作一個詳細的說明的。我們可以拿這個綱領爲中心，參考宣言，提出四個要點來說明。這四個要點可以概括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抗戰建國綱領的全部內容。這四個要點是：（一）以民族主義對抗強

暴侵略；（二）以民主制度集中全國國民力量；（三）以國防計畫建設國民經濟；（四）以科學原理與方法培養國民道德與增進國民知識。

一，以民族主義對抗強暴侵略 我們知道日本帝國主義對於中國的侵略與破壞，不是一方面的，乃是各種侵略並行。他們有軍事的侵略，就是以武力佔領中國的領土；有政治的侵略，就是在所佔領區域內建立許多傀儡政府；有經濟的侵略，在所佔地區開發礦產和攫取原料品，尤其注重煤鐵棉花羊毛等；有精神的侵略，他們要破壞中華民國的民族主義。他們在北平，設立有新民學會，這個新民學會標榜兩個主義，一個是新民主主義，一個是反民族主義。新民主主義的意思，是要將國民黨趕開，利用地方的土豪劣紳以及墮落官吏，建立傀儡組織。反民族主義是要使中華民國的國民，受日本帝國主義者的宰割，做他們的順民。

我們知道，中國在歷史上，曾數度亡到異族手中。但這幾度的亡國，在後來又都恢復過來。恢復的力量，就是在於民族主義的宣傳與活動。所以在元朝八十年間，國內不斷有民族主義的運動，尤其是長江流域與長江流域以南，常發生叛變的舉動，元朝八十年間，前二十年差不多有二百餘次的暴動，到元末則有了朱元璋等民族革命的大運動，因而恢復了中國。滿清入關以後，明末遺老在多次反抗戰爭失敗後，把民族主義寄托在會黨之中。這些會黨醞釀而為後來的同盟會。同盟會的發達，就是由於結合了會黨，喚

醒了會黨的民族主義。滿清二百餘年統治中國，並沒有絕滅中國的民族主義，所以到清末，我們民族又光復起來，建立了中華民國。由此我們就可知道，只要是民族主義不亡，我們的國家就不會亡。

日本看清楚了這一點，所以他們向中國人民提倡反民族主義。反民族主義有兩個目的，一是消滅國家觀念，使國民從觀念上隸屬於日本，一是消滅團結觀念，使中華民國國民的意志和行動分散。國家觀念和團結觀念的消滅，即是民族主義的消滅。民族主義精神不能存在，他們就可以永遠統治中國。這樣的例子，歷史上我們也可以找出一些來，金國滅宋以後，因為中國的民族主義精神藏在宗教中，他們就打擊全真道教，元朝爲了毀滅中國的民族主義。打擊江南的禪宗佛教。至于他們毀滅非宗教的民族主義集團，更是數不勝數。

所以，我們針對日本帝國主義者侵略的抗戰，首先要有民族主義，我們不但應使內地民衆的民族意識覺醒，更要在被日本帝國主義者所佔區域內，發動廣大的民族主義的運動。假如民族主義不能發揚，則我們沒有一個良好的工具來團結我們的民衆以對抗日本，當然只有使我們的國家民族趨於絕滅。

我們應當知道民族主義是我們對抗敵人唯一的精神武器。除此以外，無論是世界主義，或是國際主義，統統不能救中國，毀棄民族思想與國家界限，在一個殖民地國家和

附庸國，是宗主國所期望的。就中國而論，如果我們毀棄了民族國家的自信和自尊，我們既可以向別的國家稱藩，也就可以向日本屈膝，我們既不向日本屈膝，我們就要認定中國是中國人的中國。中國人要做中國的主人。換一句話說，就是因為我們有民族思想和國家界限，所以我們要保持民族國家的自由獨立，絕不受任何國家的宰割和支配：所以我們才以民族抗戰來給敵人以血肉的回擊，假如我們的民族主義意識有一天消滅，也就是我們亡國的一天。反之，我們的民族主義的思想能够保存並發揚，則我們不獨可以在日本軍隊沒有達到的地方，發動偉大的抗戰力量，就在已被佔領的地域，也能發動民衆的抗戰力量，終會給日本帝國主義者以致命的打擊。如果民族主義消滅了，則我們失了一個莊村就算亡了一個莊村，失掉了一個城池就算亡了一個城池，失掉一省就算亡了一省。若是民族主義思想未曾消滅，日本帝國主義者現時所佔領的中國土地，並不算是他們的，我們隨時有機會驅逐他們收回這些失地。

現在我國對日的抗戰，乃是一個長期的戰爭。有了民族主義，就不怕徐州保守不住，不怕津浦線爲日本所打通。即使是他們打通津浦線，威脅武漢，我們只要有民族主義，也一定能够取到最後的勝利。

二，以民主制度集中全國國民力量 普通國家，在戰爭時候一定要集權，要頒佈戰時的緊急法令。這就是說要把一切平時的不切合戰時狀態的法令懸了起來，執行戰時法

令。但在中國，中國國民黨認為這次抗戰與普通國家與國家的戰爭不同。例如歐洲德國與法國的戰爭，這乃是帝國主義國家與帝國主義國家的戰爭，與一般國民沒有什麼好處，所以在戰爭時一定是絕對的集權。中國對於日本的戰爭，是一個次殖民地國家對於帝國主義的戰爭，這一個戰爭，如果中國失敗，則中國就要由次殖民地地位變成日本的殖民地。如果中國抗戰勝利，中國就從次殖民地一躍而為獨立的民族國家。因為中國本是一個次殖民地的國家，所以在中國有許多落後的現象，工業不發達，政治不健全，甚至統一不能完成，民族思想缺乏。這種種的落後現象，都是要靠這次的抗戰來加以改革的。所以這一次的戰爭，同時也就是一種建設工作的開始。這次抗戰成功以後，中國就可成爲一個現代的新中國。也就爲了這一點，日本一定要攻擊中國侵略中國，使中國不能建設一個新的現代民族國家。同時中國也極力要堅強地對抗日本，以完成建設民主政治的新中國的任務。

關於實現民主政治，中國國民黨與一般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所說的民主政治不同。我們要實現民主政治，要把種種民主的障礙掃除。這些障礙是什麼？是部落思想，割據主義，是在中央政府與民衆之間的一種破裂國家統一的封建勢力。中山先生在建國大綱中規定一個訓政時期，在訓政時期內，要建設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同時以縣爲單位，發展地方自治；由中央與民衆合力掃除封建勢力，以達到民主政治。所以中國國民黨

的建國方法，與民國初年那種聯省自治運動恰恰相反。聯省自治是由地方軍隊統治一省，那實際上乃是一種割據形式，並不能算是民主政治。真正的民主政治，要有一個領導民衆破除封建勢力的強有力的中央政府。

由此，我們就可知道真正的民主政治，一定要有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與一般民衆相應。這乃是中國國民黨在革命時期建設民主國家的方法。到抗戰時期，中國國民黨想把這種民主政治，在抗戰期中樹立得更切實堅固，以強有力的中央政府集合全國各方面的意見，各方面的力量，一方面努力抗戰，一方面積極建國。就是說，我們今日於民主政治的確立，一方面是集大權於中央，一方面是集中全國國民的意見與力量，適應於抗戰的環境。爲了實現這種民主政治，所以國民黨在政治上開放國民黨的組織，希望全國有志之士都參加；在法律上保障人民在三民主義原則下，與法令範圍內有言論出版集會結社的自由，使全國民衆的意見經過國民參政會而貢獻於中央。

三，以國防計畫建設國民經濟 中國的經濟是一個不能順利發達的經濟。中國要工業有非常的發達，一般社會經濟才能發達。中國自維新與革命直到現在，也有數十年的歷史，而社會經濟畢竟沒有發達。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是一大原因。我們要發達社會經濟，當然要發達工業，發達工業，當然要建設一切資本，不但運用一般國民資本，且希望各國投資來發展中國的工業。這樣的情形是與日本不利的。日本不是一個金融資本主義國

家，日本只是一個輕工業國，他不能讓中國工業發達起來。爲什麼？因爲中國自己的工業發達，中國的各種工業原料品，就會供給自己利用。日本的工業原料，從來大部是仰給於中國。這樣一來，不是使他得不到中國的原料品，給他們工業以重大的打擊嗎？因爲這個緣故，日本帝國主義者惟恐中國走上強盛發達之道，不惜用種種蠶食或鯨吞的方法，來企圖滿足他們的野心。所以自一千九百年以來，列強大都拋棄了領土侵略的政策，獨獨日本不能。一千九百年以後，別的国家不要中國的土地，不侵害中國的主權完整，而日本在歐洲大戰時提出二十一條，北伐的有五三慘案，以後有九一八東四省的淪亡，接着有冀東的傀儡政府設立，終以演成今日的最後關頭的中華民族偉大的抗戰。

這一次的對日抗戰，也就是解放我們的工業的開始。過去我們的工業不發達，即使有一點，也因在沿海一帶，在這次抗戰中受到戰事的破壞。現在我們要維持抗戰，一定要發達我們的工業。在抗戰期中發展社會經濟，一定又要按照國防計畫，從事一種有計畫有組織的建設。到了抗戰結束以後，我們的經濟，就是有計畫有組織的國家生產與交換制度的經濟。在國家資本下有計畫有組織的生產與交換制度，這個意義就是在這種情形下沒有資本家與勞動者的分別，一切利益歸於國家，一切利益歸於社會，換句話說，就是一個民主主義的社會，一個民主主義的經濟。在這意義上，抗戰期中的經濟建議，就是民主主義的建設，社會主義的建設。

四，以科學的原理與方法來培養國民道德與提高國民知識，無論是抗戰與建國，統統是需要科學。現代的戰爭，是科學的戰爭，日本對於我們的侵略，都是利用科學的發明。我們抵抗日本，經日本以打擊，也是要用科學的發明的武器。至於現代的建設，也都是科學的建設。以工業而論，不論是大工業或農村副業，都是要依據科學的方法進行的。就是政治以及行政各方面的建設，也無一不是科學的建設。所以無論是抗戰，或者是建國，在在需要科學。

科學雖然對於抗戰建國有如此的重要性，然而中國的科學並不發達。中國科學不發達，有三個原因：第一個原因：是中國舊社會遺留下許多封建束縛。因為這些封建的束縛，使得一般民衆不相信科學，他們的生活是一種傳統的非科學的生活，他們的動作和思想又都與科學不合，五四運動就是對這種非科學的傳統束縛加以解放，五四運動的口號第一就是科學。不過，五四運動雖極力提倡科學，科學並沒因此長足地發達，這就是因為有第二個障礙。第二個障礙，是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剛才說過，日本的經濟侵略障礙中國的工業發達，中國工業不發達，所以科學也不能順利發達。工業不發達，沒有方法使用科學的發明，科學的發明無處使用，因此科學就無從發達。第三個障礙，是一種符咒式教條式的宣傳，也很嚴重的阻礙了科學的發達，科學這東西，乃是一代一代的選文戰抗經驗和知識積累下的結晶，不是一鋤頭挖一個井那樣可以得到急效。有許多人平時不注

意科學的修養，在緊急之時，希望一下就得到有效的方法，達到他們的期望，以中國的教育而論，中國每在一個重大國恥發生後，就提出「國恥教育」或是「非常教育」等等的口號，過後又寂焉無聞。這完全露暴出國人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不懂科學的根性。

這一次抗戰以來，各種抗戰救國的宣傳很多，而科學却受到很大的打擊。如果我們今日再不在教育界高呼科學的信仰，則這次的抗戰必然歸於失敗。我們若不在今後注意科學，喚起國民——尤其是青年學生，對於科學加以深刻的研究，自然我們就應付不了科學的戰爭，不能在科學戰爭中取得勝利，更不能在抗戰以後建立起現代民族國家。

一般人忽視科學有重要和對科學抱錯誤見解，都是一種缺乏理智的感情衝動，表現而為一哄而起的行爲。一哄而起只是煽動革命的方法，不是抗戰的方法，是對內的方法，而不是對外的方法，對外抗戰，必須得採用有條理有計畫和有實效的方法。有條理有計畫和有實效的方法，必都是由科學的研究而來。用科學的方法組織民衆，用科學方法設備物質，則抗戰方能持久，方能給日本帝國主義以有效的打擊。所以臨時代表大會的宣言和抗戰建國綱領中，特別提及科學，籲請全國知識界注意。宣言中昭示國民對於科學的運動，要技術與社會制度貫通，戰時與平時貫通，物質與精神貫通，感情與理智貫通。在抗戰建國綱領中關於教育一項，第一條就說要改訂教育制度與教材，推行抗戰教程，注重國民道德之修養，提高科學的研究。凡此，都是希望國民不再蹈以往忽視科學

的錯覺，要以科學的方法和原理來增高國民的知識，培養國民的道德。就是說要以有效方法抗戰，以有效方法建國。所謂有效的方法，那便是科學的方法。

以上所說。乃是就這次臨時全國代表大會宣言和抗戰建國綱領的意義和內容，加以解釋，在此，我希望諸位以及全國國民，對於這一個宣言和綱領，有確切的認識，以爲一切行動和一切思想的規則準繩。這樣，我們抗戰的勝利，和現代民主國家的建立，才可以最近的將來順利完成。（載五月九日武漢日報）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五月初版

抗戰文選 第二輯

(第三類——團結——與鞏固中樞)
(第四類——軍事上的經驗和教訓)

全四輯實價國幣一元
每輯實價國幣二角五分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編者	包清岑
發行者	拔提書店
印刷所	拔提書店
經售處	全國各大書局

拔提書店
武昌·長沙·南昌·
重慶·西安·成都·分



參 價 表

數	正	管
1	60	